

# 抗日集體記憶的民族化： 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 與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

蕭阿勤\*\*

## 摘要

本文分析臺灣一九七〇年代對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重新探索與公共領域中抗日集體記憶建構的關係，指出當時在回歸鄉土文化潮流中對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熱烈回顧，主要是由戰後成長或出生的年輕世代成員所進行的。這些戰後世代成員憑藉一個中國民族主義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將這一段文學的往事「民族化」為在台灣的中國人抗日的民族傳統。當時戰後世代在政治社會情境變動中重新建構日據下臺灣新文學的集體記憶，藉著探索過去以尋求當前與未來意識和行動的指引，其集體自我與集體過去的建構是相互辯證的。這種集體記憶重構的社會政治行動意涵，則是體制內改良主義的，相應於這個時期戰後世代的社會政治變革主張。對本省籍戰後世代成員而言，這種集體記憶的重構，目的在使本省人的過去及其中國性在公共領域獲得確認，進而使本省人的公民身份被充分承認，獲得平等的公民權與政治權。本文最後也指出，反省自我與自我對歷史的理解如何受到特定主體位置的影響，是恰當地理解過去的必要條件。

關鍵詞：認同、敘事、民族主義、集體記憶、公共領域、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

---

\* 本文為國科會八十九學年度專題研究計畫部分研究成果（計畫編號：NSC 89-2412-H-001-023），初稿曾發表於「第五回日臺青年臺灣史研究者交流會議」（2001年8月19-21日，宜蘭礁溪）。研究助理孫鴻業先生協助文獻資料的蒐集整理，謹此致謝。謝謝中研院社會所王甫昌先生與臺史所籌備處劉翠溶主任、蔡慧玉女士的修改建議，同時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批評。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助研究員。

- 一、導言
  - 二、公共領域、集體經驗敘事模式、與臺灣人抗日集體記憶的民族化
  - 三、七〇年代之前的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日本殖民統治下成長世代的回顧
  - 四、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臺灣人抗日集體記憶與中國性的再確認
  - 五、結論
- 

## 一、導 言

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一日，被其新文學同儕譽為「臺灣新文學之父」的賴和去世。<sup>(1)</sup>當時也是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發軔階段重要作家之一的楊雲萍（1906-2000），曾經令人動容地描寫賴和病逝前的一幕：

……少頃，（賴）氏突然高呼說：我們所做過的新文學運動，都等於白做了！我吃了一驚，凝視著他，他起了上半身，用左手抑著疼痛的心臟。我狼狽了，急安慰說：不，不，三十年後，或五十年後，一定有人會想到我們的事情的。<sup>(2)</sup>

這一幕發生後幾天，賴和隨即過世。賴和逝世前後，正值戰爭期間，日本殖民統治當局積極推行「皇民化運動」，企圖改造臺灣人為「真正的日本人」，以加強戰

---

(1) 賴和生於1894年。在賴和生前，王詩琅就認為他是「培育了臺灣新文學的父親或母親」，見王錦江（王詩琅）著、明潭譯，〈賴懶雲論——臺灣文壇人物論(四)〉，收於李南衡主編，《日據下臺灣新文學，明集1，賴和先生全集》（臺北：明潭，1979），頁400；原文載於《臺灣時報》，201號（1936年8月）。賴和剛去世後，朱石峰則暹稱為「臺灣新文學之父」，見〈回憶懶雲先生〉，明潭譯，收於李南衡主編，《日據下臺灣新文學，明集1，賴和先生全集》，頁422；原文載於《臺灣文學》3:2（1943年4月）。這兩篇文章又收於賴和紀念館編，《賴和研究資料彙編(上)》（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4）。

(2) 楊雲萍，〈賴和氏追憶〉，《民俗臺灣》3:4（1943年4月），頁31。此處譯文轉引自林載爵，〈日據時代臺灣文學的回顧〉，頁135。另外的譯文見楊雲萍，〈追憶賴和〉，明潭譯，收於李南衡主編，《日據下臺灣新文學，明集1，賴和先生全集》，頁410；又見賴和紀念館編，《賴和研究資料彙編(上)》，頁17。

爭動員。當時「皇民奉公會」對作家的動員與控制、「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召開，都代表了這期間是「作家個人或集團的個性及其可能性被抹殺壓制，一切為建設南進基地臺灣的文化決戰體制，而實行統制統合」的階段。<sup>(3)</sup> 辭世前的賴和，何以如此悲觀，我們難以確切了解。可以揣測的是，做為殖民統治下的知識份子，賴和或許有感於戰爭期間皇民化運動極端同化政策的威脅，或者無法預期殖民統治的結束，因此有上述悲痛的呼喊。不過，的確就在楊雲萍安慰他時所提的三十年與五十年後，出乎賴和所能預料的，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然而在這個三十年與五十年後的兩個時期，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分別受到非常不同方式的理解。賴和逝世後的三十年左右，正當一九七〇年代。當時在蓬勃發展的「回歸鄉土」潮流中，臺灣的知識份子重新探索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當時在社會上佔優勢的理解方式是：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發展，是一九二〇年代之後臺灣知識份子抗日新文化運動的一部分，是受到祖國——中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所產生，因此也是中國文學發展的一部分；而當時臺灣新文學作家也是抗日並認同祖國的，他們文學創作的的基本動機就在抗日，而最終目標則在促使臺灣回歸祖國。

然而相對的，在賴和逝世後五十年左右的一九九〇年代前後至今，由於臺灣政治與文化普遍本土化、臺灣化的發展，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與探討。在政治與文化本土化、臺灣化的趨勢中，一種從「臺灣民族主義」的角度理解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方式，逐漸佔有相當的社會優勢。<sup>(4)</sup> 舉例而言，這種理解方式強調「臺灣新文學的誕生，可以說完全是在臺灣人應有自己的文化，進而應有自己的文學的主觀意願催生出來的，具有族群特徵的文學。」而「自一九二〇年代的新舊文學論爭之後……新文學的職務即在喚醒臺灣人的臺灣人自覺，而臺灣人的自覺又以喚起臺灣人與土地之歸屬感為濫觴」。換句話說，「一九二〇年代，臺灣新文學隨著《臺灣青年》、《臺灣》、《臺灣民報》等鼓吹臺灣

(3) 尾崎秀樹著、蕭拱譯，〈戰時的臺灣文學〉，收於王曉波編，《臺灣的殖民地傷痕》（臺北：帕米爾，1985），頁185。原文收於氏著，《舊殖民地文學の研究》（東京：勁草書房，1971），頁154-219。

(4) 關於一九八〇年代以來臺灣民族主義在文化領域——特別是文學、語言與歷史方面——的發展，參見筆者先前的研究：蕭阿勤，〈1980年代以來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以「臺灣（民族）文學」為主的分析〉，《臺灣社會學研究》3（1999），頁1-51；A-chin Hsiao（蕭阿勤），*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2000)。

文化論、以建構臺灣民族為目的之文化雜誌，應運而生，因此，臺灣新文學不但是臺灣新文化運動的尖兵，更對臺灣民族的形成、臺灣社會的改造都有具體而直接的貢獻，「臺灣歷史上有臺灣民族解放運動，也有臺灣政治獨立運動，乃是社會與政治的本土化運動，此二者的本土化未必有本土化之名，但就追求各自運動領域的自主性，與文學本土化追求的自主性是一致的。目的都在抗拒外力的壓迫和扭曲，抵抗侵略，反抗被消滅、併吞。」<sup>(5)</sup>簡而言之，從這種臺灣民族主義出發，因此強調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人屬於漢民族卻不是中國人，有日本國籍卻不是大和民族」，於是當時「代表臺灣民眾心聲的臺灣新文學作家逐漸形成了共同的意願，那便是『臺灣是臺灣人的臺灣』這種主張。」<sup>(6)</sup>一九九〇年代前後以來，這種逐漸佔社會優勢的看法認為：「臺灣文學是臺灣人的文學，是產生於這塊土地、這個人民、這個文化背景下的文學作品，跟中國文學是無關的」，而日據時期的臺灣新文學「不是中國文學，也不是日本文學。」<sup>(7)</sup>

本文的目的，就在分析臺灣一九七〇年代對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重新探索與公共領域中「抗日」集體記憶建構的關係，而其主要的論點指出：當時在回歸鄉土文化潮流中對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熱烈回顧，主要是由戰後成長或出生的年輕世代（以下稱為「戰後世代」）成員所進行的；這種對殖民統治下一段文學往事的熱烈探究，可以說是這些深受中國民族主義教化的年輕世代成員基於中國人的集體認同所進行之「（臺灣的）中國人抗日」集體記憶的建構行動。至於八〇年代以後，乃至於上述九〇年代以來至目前的情況，限於篇幅，只能留待他日討論。

戰後臺灣對於日本殖民統治的集體記憶之建構，與政治、文化的變遷有密切關係，而這種關係在不同時期各有變化。當前的文化政治發展與關於過去的集體記憶建構之間的辯證關係，其中所涉及的一個中心議題，即為戰後臺灣的「民族／國家認同」之建構與發展。<sup>(8)</sup>以下在探討七〇年代的相關情況之前，有必要先

(5) 彭瑞金，〈當前臺灣文學的本土化與多元化——兼論有關臺灣文學的一些異說〉，《文學臺灣》4（1992年9月），頁12-13。

(6) 葉石濤，《臺灣文學入門》（高雄：春暉，1997），頁6。

(7) 鍾肇政，《臺灣文學十講》，莊紫蓉編（臺北：前衛，2000），頁15、17。

(8) 本文使用「民族／國家認同」一詞，或是在相關用語中並舉「民族／國家」，首先是因為就「現代民族主義」（modern nationalism）而言，民族（nation）與國家（state）的關係密切，難以相互脫離而孤立地來討論。就像 John Breuilly 所說的：「如果不談國家，民族主義是無法想像的，反之亦然。民族主義的

簡略地討論七〇年代前後臺灣社會的公共領域中，對日據時期之集體記憶建構的一般變化，並進一步說明本文的問題意識。

## 二、公共領域、集體經驗敘事模式、 與臺灣人抗日集體記憶的民族化

「日據時期」的歷史經驗是什麼？對「我們」而言，這一段「過去」究竟意味著什麼？它對日後臺灣的政治、社會，或文化發展，有何關連？這一段過去，和中國過去與當前的歷史發展有何關係？做為一個「中國人」或「臺灣人」，我們應該怎樣理解這一段過去？「光復」，以及接下來的相關歷史經驗，究竟意味著什麼？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臺灣人與接收政權的國民黨政府，在臺灣戰後的不同時期，都曾經以或多或少不同的方式，回答上述一連串的問題。這些問題，可以說是關於「如何面對過去」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事實上就等於在建構關於這一段過去的集體記憶——亦即針對日本殖民統治的經驗內涵、特質、文化與政治意義、歷史定位等，建構一整套知識內容與詮釋方式等，並且希望「我們」「中國人」或「臺灣人」以這種特定方式記憶這一段被殖民統治的過去。

這種集體記憶建構，對做為「祖國」代表的國民黨政府而言，牽涉的是在經歷五十多年異族統治的地區，如何發展一個可以被視為合理正當的 (justifiable) 被殖民「集體經驗敘事模式」，以做為整合民族／國家認同的重要憑藉。就許許多多對國民黨統治抱持不同程度、不同異議方式的人們（包括本、外省籍）而言，回顧這一段殖民統治的過去，重點則在於發展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另類記憶，亦即以其另類的被殖民集體經驗敘事模式，做為建構集體認同與激發集體行動的

---

核心目標是以『民族』之名所正當化的自主（通常指的是在民族的領域上建立一個主權國家）。……〔在人類歷史上〕這完全是新穎而獨特的。在此之前，很少有政體宣稱對它們的『人民』（people）是負有責任的（accountable），更別說曾想像它們的臣民構成一個民族。」見 John Breuilly, "The State and Nationalism," in Montserrat Guibernau and John Hutchinson, eds., *Understanding Nationalism* (Cambridge, UK: Polity, 2001), p. 32。其次，固然有一些研究者使用「國族」一詞來兼容民族與國家的意義，但中文傳統慣用的仍為「民族」一詞，並且慣用的「民族主義」也含有民族的字眼。筆者一方面為了保存傳統用詞，另一方面為了提醒讀者現代民族主義中民族與國家不可分的關係，因此以「民族／國家」的複合方式來表達與討論。

重要「象徵資源」之一。<sup>(9)</sup>

戰後直到一九七〇年代左右，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本、外省人的政治、社會、文化關係不平等，以及國、共鬥爭的歷史形構下，在臺灣社會的公共領域中被視為合理正當的日本殖民統治歷史的集體記憶基調，大致包括下列幾個相關要素：(一)強調臺灣人民與大陸人民血緣上、歷史上、文化上密切的同胞關係；(二)強調中華民族、中國人對開發臺灣的貢獻；(三)強調臺灣同胞心繫祖國的民族主義精神；(四)強調中國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對臺灣人抗日行動的影響；(五)強調國民黨領導的八年抗戰對臺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貢獻；(六)強調臺灣在反攻復國任務中的重要性。這些基調從國民黨的中國民族主義出發，環環相扣，構成一個完整的、關於「臺灣與中國大陸關係」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這個敘事模式，事實上就是國民黨政府對本文前面提到的一連串與「如何面對過去（日據時期）」相關問題的回答。

在許多與民族／國家認同建構有關的集體記憶中，「他者」所引起的「苦難」（包括剝削、壓迫、侵略等），以及對這種苦難的「抵抗」（包括不合作、逃離、武力抗拒等），往往扮演極重要的角色。在戰後臺灣文化與政治發展的不同階段，關於日本殖民統治的集體記憶建構中，「抗日」經驗——尤其是日本殖民統治早期的武裝抗日——可以說居於核心位置。在這個被殖民集體經驗敘事中，實際上也以「抗日」的集體記憶建構與民族／國家認同議題的關係最密切。在上述國民黨統治的公共領域中被視為合理正當的日本殖民統治集體記憶，其中臺灣人的抗日經驗，可以說被「模式化」——亦即被「中國化」，或者更恰當地說，是被「(中國)民族化」——而成為其集體經驗敘事模式中一個極重要的歷史情節。

事實上，戰後三十年左右，亦即到一九七〇年代前後，關於日本殖民統治時代的集體記憶，幾乎就等於抗日的集體記憶。這種情況，可以由這個階段學術界對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研究反映出來。翁佳音在回顧這個階段臺灣歷史學界對「臺灣抗日史」的研究時就指出：

然而由於一些政治上或學術上的原因，臺灣史學界並沒有對日據時期的

(9) 關於集體記憶做為一種「集體經驗敘事(narrative)模式」，以及它做為建構集體認同的象徵資源等討論，見筆者先前的研究：蕭阿勤，〈民族主義與臺灣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一個文化(集體)記憶變遷的探討〉，《臺灣史研究》6:2(2000年10月)，頁83-88。

臺灣史本身（1895-1945），進行過廣泛的探究與研究，卻唯獨對日人侵臺、及臺灣人的抵抗史頗為注意。這方面的研究幾乎占日治時期的絕大部份，如果說學者對日治時期臺灣史的研究只是狹隘地在討論「臺灣抗日史」也不為過。<sup>(10)</sup>

不過臺灣人的抗日經驗在公共領域中被「(中國) 民族化」的情形，到了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以後，因為政治、文化的「本土化」、「臺灣化」，開始有所改變。一些研究者已經概略地描述這種變化。<sup>(11)</sup>但是迄今為止，對於戰後不同時期臺灣社會公共領域中較整體的日本殖民統治集體記憶建構的變遷，仍然缺乏詳細的研究。即使僅就臺灣人「抗日」的集體記憶建構在公共領域的變化而言，也尚待研究者針對不同時期的政治、社會、文化等脈絡進行探討。本文正是針對七〇年代臺灣人抗日集體記憶建構的一個分析。

本文所謂的「公共領域」，指的是工作場所、政治活動、傳播媒體等向不特定的人們開放的生活領域。與這種開放的生活領域相對的，是個人的思考、家庭內部成員的互動、親戚、朋友的來往等私密的生活領域。本文的分析焦點界定在公共領域中的集體記憶建構，事實上意味著筆者容認一種可能：亦即戰後臺灣社會中的某些個人或彼此具有密切關係的一群人，在他們的私密生活領域中，也許存在著某些關於日本殖民統治或抗日的特殊記憶，甚至這些記憶可能相當不同於本文所討論的公共領域中的集體記憶建構。在戰後臺灣戒嚴統治與白色恐怖的威脅下，某些個人或人群之間存在著這種另類記憶，然而卻無法進入公共領域，發展

(10) 翁佳音，〈簡介國內的「臺灣抗日史及其相關題目」研究狀況〉，《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10（1990年9月），頁121。

(11) 譬如周婉窈就觀察到：「日本武力領有臺灣，遭遇臺灣人民頑強的抵抗。過去在戒嚴時期，日本殖民時代歷史偏重早期的武裝抗日運動，近年來臺灣史研究蔚為風潮，各式各樣的題目都有人在研究，官方色彩的『抗日史觀』已不再時興。」周婉窈，《臺灣歷史圖說》（臺北：聯經，1997），頁109。王明珂也簡略地指出八〇年代中期以後政治、文化的「本土化」發展，伴隨的是公共領域中日本侵華與大陸八年抗戰的集體記憶「明顯的歸於平淡」；而臺灣日據時期的集體記憶則「被重新塑造，不愉快的記憶被刻意隱藏。」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1997），頁391-392。筆者在先前的研究中也指出：自一九八〇年代以來，臺灣文化民族主義者逐漸把日本殖民統治視為一項歷史「資產」，將這一段歷史經驗建構為「臺灣文化特殊性」——尤其是有別於中國文化的——重要的多元來源之一。蕭阿勤，〈1980年代以來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頁28-29、37；A-chin Hsiao（蕭阿勤），*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pp. 101-102, 107-108.

為普遍被接受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而與國民黨所建構者互相競爭，這毋寧是可以理解的。不過就本文的問題意識而言，即使在私密生活領域存在著特殊的記憶，也不妨礙本文的討論。第一，本文的分析重點是「集體」記憶（「對『我們』中國人或臺灣人而言，這一段殖民統治的『過去』，究竟意味著什麼？」）。如同筆者先前的文章所指出的，「研究集體記憶，主要就在研究和某一群人的集體認同有關的過去，以及它與這個集體認同的發展和相關的社會行動的相互關係。」這種與集體認同建構有關的過去，並不同於生活實踐本身，或是人們在過去如實的經驗本身，同時也不是這些生活實踐與實際經驗的簡單呈現。相對地，在現代社會中，它們通常是那些有較大的機會與能力接近、掌握，與運用象徵資源的人——譬如政治與文化菁英——在公共領域經由再現的過程，將過去的經驗「意義化」與「象徵化」的產物。某種過去與某個集體認同建立特定意義的關係、取得特殊的象徵意涵，並不是必然的。這種關係的建立，往往是藉著將過去納入某種「集體經驗敘事模式」而達成的。<sup>(12)</sup> 人們對過去的經驗，通常只有經由上述過程——亦即進入公共領域，與其它引發異議與不滿的當前社會政治議題接合（articulate），而被闡述發揮（elaborate）並條理化（formulate），才具有建構集體認同而催發集體行動的力量。許多個人或人群在私密生活領域中對某一段過去的特殊記憶，通常不相統屬而互不關連，因而可以說是零散而碎裂的。它們因為無法進入公共領域，因此也就無法互相聯繫而被進一步闡述發揮、被條理化為一種集體經驗的敘事模式，進而具有改變或形塑人們集體認同、建立社會行動共識的潛能。在這種情形下，即使這些個人或人群的特殊記憶是關於一段共同的過去，也很難說它們是一種「集體」記憶。譬如說，在八〇年代末之前，許多本省人對「二二八事件」，也許都有異於國民黨描述的另類記憶。在事件後的四十年當中，臺灣社會的不同角落，事實上的確散佈者種種親身經歷的記憶、口耳之間的傳聞、甚至捕風捉影的揣測。然而一直要到一九八七年初陳永興等人領導「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以群眾集會與示威遊行等各種方式，將這個禁忌的歷史轉變為公共議題，二二八事件才與八〇年代黨外、民進黨對國民黨的批判接合起來，並且在「臺灣意識」的推動下，逐漸被納入發展中的臺灣民族主義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得到

---

(12) 蕭阿勤，〈民族主義與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頁 82。



條理化的詮解，也展現其形塑「臺灣人」認同的明顯作用。<sup>(13)</sup> 換句話說，與某種集體認同建構有關的集體記憶，通常不是一群零散的個人記憶簡單匯聚的總和，而是藉由一個具有特殊主體位置觀點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將特殊的意義賦予種種相關的過去，使他們產生內在的、整體的聯繫，而將對這些過去的理解模式化、結構化的過程與結果。

第二，對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而言，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種種，不是他們親身經歷的生活經驗。因此他們如何回顧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依賴的不是個人對親身經驗的記憶。換句話說，他們對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記憶，更不會是實際經驗的簡單呈現，也不是個人記憶匯聚的總和，而主要是一個集體經驗敘事模式在公共領域中所結構化的種種相關的過去。因此，研究七〇年代戰後世代對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重新探索，重點應放在分析他們如何以特定集體經驗敘事模式結構化地再現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以及這樣的集體記憶建構進入公共領域中而對戰後世代集體認同發展的影響。本文的問題意識針對的是「過去」在社會的公共領域中如何被模式化地建構，並且指出一個能在公共領域出現而條理化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對於建構集體認同、甚至催發集體行動的重要性。本文的旨趣不在於研究那些個人意識的曖昧空間，亦即不在於發掘那些私密生活領域可能存在的另類理解，也不在於解讀那些隱微不彰的幽情潛意。正因為本文的問題意識在探討戰後世代於七〇年代臺灣社會的公共領域中，如何以特定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將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模式化——（中國）民族化——為臺灣人抗日的集體記憶，因此即使當時於某些戰後世代——也包括比他們年長的世代——成員之間，在私密的生活領域，對於臺灣的過去與未來，醞釀或存在著不同程度上的另類理解，也不妨礙本文的討論。如同本文下面的分析指出的，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在公共領域再現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主要依賴的是一個中國人、中華民族主體位置觀點的中國民族主義集體經驗敘事模式。本文也指出，親身參與過日據時期新文學發展的年長世代，在七〇年代前後公開回顧這段往事時，也大致不離這個模式。

(13) A-chin Hsiao (蕭阿勤), *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pp. 168-170; Bing-hui Liao (廖炳惠), "Rewriting Taiwan's National History: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as Spectacle," *Public Culture* 5: 1 (Winter 1993), pp. 281-296.

一九八〇年代中期之後，有別於國民黨官方角度的臺灣人抗日集體記憶——甚至較整體的日本殖民統治的集體記憶建構，在公共領域逐漸浮現。二十年來，臺灣社會的民族主義政治與文化衝突中，一個核心的議題正是不同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無法並容。這個問題出現之前的上一個十年——亦即一九七〇年代，臺灣社會的公共領域事實上已出現一波新的、非國民黨官方的重構嘗試。這種嘗試主要由戰後在臺灣出生或成長的年輕世代知識份子，在回歸鄉土潮流中所進行，而這些年輕知識份子，同時包括本、外省籍。目前關於七〇年代文化變遷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探討鄉土文學的興起及其相關議題。許多研究者也指出，在當時回歸鄉土潮流中，鄉土文學的提倡或支持者也同時重新探討一向受忽略的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以及日據時期以來持續創作的本省籍作家與其作品。但是這些研究對這種集體記憶建構的現象，以及它與更廣泛的民族／國家認同議題的關係，都缺乏專注的研究。同時既有的研究也相當忽略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批判現代主義文學、重探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等相關的回歸鄉土潮流與世代現象的關係。<sup>(14)</sup>再者，戰後世代的知識份子的日本殖民統治集體記憶建構，並不限於文學方面，而是同時包括政治方面的「抗日」運動。<sup>(15)</sup>事實上，由於七〇年代戰後世代知識份子的民族／國家認同的基本傾向，以及特殊的政治變遷環境，當時對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重新探討與評價，也著重在建構其所具有的抗日意義上。關於這一點，目前的研究少有分析與解釋。本文正是針對這些研究上的不足，希望能加深我們對七〇年代的了解。

傅柯 (Michel Foucault) 在晚年回顧自己過去二十年的研究，曾經指出他的目的始終是企圖寫出關於「在我們〔西方〕的文化中人們被變成主體的不同方式之歷史」。<sup>(16)</sup> 傅柯告訴我們，主體 (subject) 一詞同時兼具兩種意義：一方面指因為依賴與受制於他人而從屬於他人，另一方面指因為對自我的知識而受制於自

---

(14) 筆者的〈民族主義與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一文是一個初步的嘗試，該文探討七〇年代回歸鄉土潮流、「復甦的」中國民族主義等現象與戰後出生或成長的本、外省籍年輕一代知識份子的關係。

(15) 陳正靛在他 1981 年的文章中的一個註腳已指出這一點，見氏著，〈臺灣的鄉土文學論戰(1977-1978)〉，收於《臺灣鄉土文學、皇民文學的清埋與批判》(臺北：人間，1998)，頁 174，註 87。

(16) Michel Foucault, "The Subject and Power," in Hubert L. Dreyfus and Paul Rabinow,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82), p. 208.

己的認同。<sup>(17)</sup> 同時他從歷史的觀點，指出人類社會存在三種類型的鬥爭：分別是反抗各種形式的宰制 (domination) (族群、社會、宗教等的宰制)、反抗各種形式的剝削 (exploitation) (剝削人們所生產的東西)，以及反抗從屬 (subjection)、反抗各種形式的主體性 (subjectivity) (使個人因為其認同而受制於他人) 的鬥爭。傅柯指出，由於西方現代國家做為一種新的政治統治形式，擁有人類社會有史以來——包括古老的中國社會在內——建構人們主體性的最發達的制度與技巧、擁有建構人們主體性的極大權力 (power)，使得反抗從屬、反抗各種形式的主體性帶來的屈從，在現代西方社會愈來愈重要。因此他認為：「也許在今天，我們的目標不是去發現我們是什麼，而是去拒絕我們是什麼」，尤其是把我們從那種與國家結合的主體建構方式中解放出來，尋求新的主體性的形式。<sup>(18)</sup> 傅柯在這裡關於主體與權力的理論，主要基於特定的西方現代國家的發展階段 (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福利國家) 以及對其反抗 (特別是六〇年代後的新社會運動) 的歷史經驗。<sup>(19)</sup> 不過在我們這個時代，即使包括許多非西方地區或尚未擁有自己所屬國家的人群而言，現代民族國家仍然是大部分人們視為當然而認同的統治模式與政治社群，而民族主義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也仍然支配大部分受教育階層者對過去的理解。因此，傅柯關於現代國家與主體性建構的理論，提醒我們注意歷史的理解如何可能受到現代民族主義的限制，可以說深具啟發性。

本文探討的，不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人的抗日歷史本身，而是這一段「過去」在一九七〇年代如何地被記憶，特別是這一段過去的記憶如何被「民族化」(nationalize) 的過程。這裡所謂的「民族化」，同時具有兩方面的意義。第一、它指的是將某一段過去所涉及的「我們」的先行者 (或祖先) 呈現為「民族主義者」。這是指將這些先驅描述成自覺地認知到自己是一個「民族」的成員、相信自己所屬的這個民族的利益與價值高於一切、同時追求民族在政治上的獨立自主，並且他們許多值得我們紀念的言論與行動，都是基於這種民族主義者的身份與認同而產生的。<sup>(20)</sup> 第二、基於上述論點，將這一段過去視為「我們的」(「我們民族

(17) Michel Foucault, "The Subject and Power," p. 212.

(18) Michel Foucault, "The Subject and Power," pp. 213, 216.

(19) Ibid., pp. 211-212.

(20) Breuilly 指出，做為一種政治信條，一個民族主義者為了正當化其行動所提出的論證，通常是基於下列三項信念：(-)存在著一個具有明顯而特殊性格的民族；(-)這個民族的利益與價值高於其它的利益與價

的」) 過去,賦予這一段過去一種民族的性格而使之成爲「民族傳統」的一部份。這種過程與結果,是「民族化」的另一層意義。換句話說,這就是 Eric Hobsbawm 等人所謂的「發明傳統」。(21) 本研究分析焦點,正在於利用一九七〇年代左右的各種相關文獻資料,探討當時戰後世代對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熱烈追索的過程,並分析這種過程中所建構的臺灣人抗日的(中國)民族傳統。

### 三、七〇年代之前的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 日本殖民統治下成長世代的回顧

臺灣社會從戰後到七〇年代之間,並非不曾對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文學發展進行公開的討論。在這段時期,從事這種歷史回顧的,幾乎全部是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親身參與過新文學發展的本省籍人士。這些從一九二〇年代中期陸續步入文學生涯的世代,大都出生於二十世紀最初的十年左右,而臺灣光復時他們大約在四十歲光景。到了七〇年代開始時,如果他們還健在,則都已屆六十歲上下。從戰後到七〇年代,這些親身經歷日本殖民統治的世代,抱著緬懷過往的心情,回顧當時的臺灣新文學發展。(22) 在戰後二十幾年間,這種公開的回顧,相對於七〇年代初之後討論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熱絡而言,可以說是零星而稀少的。另一方面可以想像的是,這些資深世代必須注意是否違反公共領域中國民黨政府所定位的日據時期集體記憶的基調。因此這些公開討論,不時有干犯禁忌的危險。這期間這個世代的本省籍人文知識份子對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歷史回顧,可以臺北市文獻委員會分別在一九五四年八月與十二月出版的兩期《臺北文物》爲代表(三卷二期的「北部新文學、新劇運動專號」與三卷三期的「新文學、新劇運動專號續集」)。這兩次的特輯邀請二十幾位親身參與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活動者撰

值；(三)民族必須儘可能獨立自主,而這通常至少要獲得政治主權方可能達到。見 Breuilly, *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p. 2.

(21)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22) 從戰後到七〇年代之前,這個世代回顧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發展的文獻,可以參考下列文章的整理:傅博,〈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評價問題〉,《文星》104(1987年2月),頁107-114;松永正義,〈臺灣新文學運動研究的新階段〉,《新地文學》1(1990年4月),頁32-51;許俊雅,〈「日據時期臺灣文學」研究概況〉,收於其《臺灣文學散論》(臺北:文史哲,1994),頁1-36。

稿，並且以座談方式，對當時臺灣新文學的發展，做了相當廣泛的回顧。<sup>(23)</sup>然而正如後來的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在戰後二十幾年中，《臺北文物》這兩期的回顧特輯，是令人意外、相當突然的一個舉動。事實上，其第三卷第三期在發行前即遭官方查禁。這一次親身參與者較集中的公開討論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也就嘎然而止。<sup>(24)</sup>

從《臺北文物》刊行特輯的五〇年代中期，到七〇年代戰後世代重新探究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這中間的十七年左右期間，大致上只有王詩琅、葉石濤、吳瀛濤、黃得時等人發表的幾篇文章，回顧了當時臺灣新文學的發展。<sup>(25)</sup>王、吳、黃三人均曾在上述的《臺北文物》特輯中撰稿。至於葉石濤則生於一九二五年，是日本殖民統治末期才步入文學生涯、當時最年輕的一位日文作家。因此這幾篇文章，仍然都是親身參與當時文學活動的世代的懷舊之作。在一九六四年〈日據時期的臺灣新文學〉一文中，王詩琅感嘆當時「志願從事文藝工作的青年人」已經對日據時期新文學發展「這一段史實不但懵然，甚至一無所知」。因此他撰寫這篇文章的目的，就在於「供未知讀者『溫故而知新』」。王詩琅強調，「日據時期的臺灣新文學是臺灣新文化運動的一部份，而臺灣新文化運動則是當時反日民族運動的一分支隊伍。……它〔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雖然是針對沒有內容，喪失生

(23) 這兩次特輯所涵蓋的文獻詳目，見《臺北文物》3:2與3:3。七〇年代日據時期新文學重新受重視後，李南衡將這兩期特輯中的大部份文章收入他所編輯的書中，見李南衡主編，《日據下臺灣新文學，明集5，文獻資料選集》（臺北：明潭，1979）。參見下文的討論。以這兩期特輯中參與座談撰稿者為例，大致都出生於二十世紀最初的十年左右，譬如（姓名後括號內為其出生年）：吳濁流（1900）、黃師樵（1900）、王白淵（1902）、楊雲萍（1906）、吳新榮（筆名瑣琅山房主人，1907）、郭水潭（筆名郭千尺，1907）、王詩琅（筆名王錦江、王一剛、王榮峰，1908）、黃得時（1909）、龍瑛宗（1910）、廖漢臣（筆名廖毓文，1912）、吳瀛濤（1916）。

(24) 傅博，〈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評價問題〉，頁107-108；許俊雅，〈「日據時期臺灣文學」研究概況〉，頁2-3。

(25) 王錦江（王詩琅），〈日據時期的臺灣新文學〉，《臺灣文藝》1:3（1964年6月），頁49-58；葉石濤，〈臺灣的鄉土文學〉，《文星》97（1965年11月），頁70-73；吳瀛濤，〈概述光復前的臺灣文學(-)〉，《幼獅文藝》216（1971年12月），頁274-282，與〈概述光復前的臺灣文學(=)〉，《幼獅文藝》221（1972年5月），頁54-60；黃得時，〈臺灣光復前後的文藝活動與民族性〉，《新文藝》190（1972年1月），頁37-47。另外，傅博在〈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評價問題〉，頁108中曾提到，尚有王詩琅（以王一剛的筆名發表）的〈臺灣新文學運動與大陸〉（《臺灣風物》9:5/6〔1959年12月〕，頁3-5）與廖漢臣的〈臺灣文學年表〉（《臺灣文獻》15:1〔1964年3月〕，頁245-290）二文。但王詩琅文章的標題實為〈臺灣新文化運動與大陸〉，內容亦為泛論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知識階層的新文化運動，只有不到三行的文字述及新文學的發展。《臺灣風物》該期目錄誤載這篇文章的標題為〈臺灣新文學運動與大陸〉，而傅博或許根據的是這個錯誤的目錄。至於廖漢臣的年表則為條列式內容，並無論說。

命的舊文學，尤其是對舊詩而發，但潛在人心的反抗異族統治的民族思想則是最大的原動力。」王詩琅特別指出，這種對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特質的看法，「在今日可以說是一個常識，也是我們應有的基本認識」。然而對王詩琅來說，由於臺灣的光復，「日據時期當中，曾有一段小小的歷史的臺灣新文學而言，顯然因此已告了一段落，[臺灣新文學] 現在已在下一代的手裡，雜在大陸來臺的文藝工作者中重新開始了出發。」<sup>(26)</sup> 緬懷過往、瞻望未來，王詩琅如此思考本省籍文學作家的創作依歸，他說：

現在由於臺灣的光復，異族統治的桎梏已經解除，過去限制臺灣文學的客觀條件，已在這鉅大的歷史轉變下改觀了。那麼今後臺灣文學的方途[筆者按：原文如此] 在那裡呢？光復以還，二十年來我們知道，臺灣的一些文藝工作者一是爲了本身的寫作條件，一是爲了這個問題，顯在彷徨[筆者按：原文如此]，甚至撒手離開了。

然而我們知道，臺灣的文化，本來就是中國文化的一支流，中國文化的延長。而臺灣文學當然也是中國文學的一支流，中國文學的延長。臺灣文學既然擺脫了日據時期加在身上的枷鎖，恢復原來的姿態，它的途徑是很明顯的。那就是循著中國文學的路線，建設臺灣「地方文學」，建設臺灣「鄉土文學」。<sup>(27)</sup>（底線爲筆者所加）

王詩琅這篇文章發表後的隔年（1965年），葉石濤在其〈臺灣的鄉土文學〉一文中，也表達了與王詩琅類似的態度。在這篇文章中，葉石濤將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到六〇年代本省籍作家的新文學創作統稱爲「（本省或臺灣）鄉土文學」<sup>(28)</sup> 做爲文學生涯橫跨日本殖民時期到光復後的世代之一份子，葉石濤和王詩琅一樣，抱著慨然以談往事的心情，表示「願意做一個起碼的見證人」，將他的「見聞如實地寫出來」<sup>(29)</sup> 葉石濤認爲，「本省鄉土文學在日據時代確實有提倡的必要，藉此發揮民族精神，領導對日本人的抵抗運動，有其必需存在的歷史性。」然而他同

(26) 王錦江（王詩琅），〈日據時期的臺灣新文學〉，頁49、57。

(27) 同上註，頁58。

(28) 傅博認爲，七〇年代流行的「鄉土文學」一詞，可能源自葉石濤的這篇文章。見傅博，〈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評價問題〉，頁108。

(29) 葉石濤，〈臺灣的鄉土文學〉，頁70。

時指出，在光復後，這種突出臺灣「鄉土」特殊性的文學創作，既無須再大聲提倡，也無必要繼續存在，理由是：對戰後年輕世代的本省籍作家而言，日本殖民統治的記憶已淡去，而他們心中更少執著於臺灣一地的「畛域的觀念」。因此葉石濤強調，年輕的本省籍作家固然不能完全放棄探索臺灣鄉土現實的特殊性——因為這樣可以「給我們中國的文學添加更廣的領域」，但其最終的目標則在「自然地熔化在中國文學裡，更進一步地努力形成為世界文學的一翼。這是鄉土文學的最好歸宿，也就是上一代作家夢寐以求的結果。」<sup>(30)</sup>

另外，吳瀛濤的遺作——在他逝世那年與隔年（1971、1972年）連續發表的〈概述光復前的臺灣文學〉一文，開宗明義即強調「日據時期的臺灣文學，以竊據者的日本來說，是殖民地文學，但以淪陷區的臺灣來說，卻正是嚮往祖國，與異族的統治抵抗，發揮了民族正氣的中國文學的一環。」<sup>(31)</sup>至於黃得時在一九七二年發表的〈臺灣光復前後的文藝活動與民族性〉一文中，<sup>(32)</sup>則認為「光復以後臺灣的文藝活動情形，好像是一個人趕路時，很緊張，也不會感覺疲倦，但一旦到家，就累得靠在躺椅上不能動彈了。日據時代，作家們以抗日歸宗作為奮鬥目標，光復後投入了祖國懷抱，就覺安心了，作品就減少了。」<sup>(33)</sup>對於早在日據時期就開始寫作的資深本省籍作家在光復後這種創作停頓的情形，黃得時並沒有表示太多的惋惜。他說：「在光復前後的三十年間，一些老作家已呈退休狀態。幸虧光復後許多大陸上的作家、出版家來到臺灣，在他們的鼓勵下，年輕一代的本省作家已嶄露頭角，也有很多位獲得多種文藝獎金，這對本省的文藝活動，是件可喜的事情。」<sup>(34)</sup>

綜合而言，從五〇年代中期《臺北文物》刊行特輯，到七〇年代初戰後新生代重新探究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十七年左右，以王、葉、吳、黃四人的文章為

(30) 葉石濤，〈臺灣的鄉土文學〉，頁73。

(31) 吳瀛濤，〈概述光復前的臺灣文學(-)〉，頁275。

(32) 這篇文章原為黃得時應國防部總政戰部的「國軍新文藝運動輔導委員會」邀請演講的紀錄，後來發表在《新文藝》中，而這份刊物也是總政戰部主辦的。當時黃得時為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33) 黃得時另外指出兩個原因，一是日據末期，能用中文寫作的人已漸減少，「因此光復前用日文寫作有成就的作家，到光復後就變成無能為力了」；二是「因為光復前後，社會型態變動太大，日據時代的作家都不是職業性的，光復後，大多為了個人的職業關係，就不再寫作了。」見黃得時，〈臺灣光復前後的文藝活動與民族性〉，頁47。

(34) 同上註，頁47。

代表，可以看出日本殖民統治下成長的本省籍文學作家在公開回顧過去臺灣新文學發展時，相當突出的一個共同點，是強調它們「抗日」的特質——亦即認為抗日不僅是日據下臺灣作家創作最主要的動機，而且他們的作品本身就是抗日行動的表現，因此整個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是「抗日運動」的一部分。然而更重要的是，對這些緬懷過往的資深作家而言，這些文學上的抗日，是中國民族主義的——亦即日據時期臺灣作家在文學上的抗日，是以做為中國人的認同意識出發，而以臺灣脫離日本殖民、回歸中國的統治為目標。<sup>(35)</sup> 既然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是一種基於中國民族主義的抗日實踐，它當然是中國文學的一部份。另一方面，既然光復已達成回歸中國統治的目標，那麼以抗日為最主要創作動機的日據時期臺灣作家的使命已達成，自然可以功成身退。對於戰後在國民黨體制下成長的本省籍年輕世代作家的融入中國文學世界，他們也視為當然而樂觀其成。簡而言之，在七〇年代初之前，以王、葉、吳、黃等人為代表的這些親身經歷日本殖民統治的本省籍作家，在公開回顧當時的臺灣新文學發展，回答「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是什麼？對現在的『我們』意味著什麼？」之類問題時，其參考架構基本上與戰後臺灣社會公共領域中國民黨所建構、容許的日本殖民統治的集體記憶模式沒有太大的差別——或者我們可以說，他們事實上接受了這種集體記憶模式，而也以此方式來回顧、理解他們曾親身經歷的過去。

#### 四、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 臺灣人抗日集體記憶與中國性的再確認

七〇年代初，臺灣社會出現一股積極關懷公共事務、要求政治社會改革的力量，對國民黨統治形成明顯的挑戰。正如李筱峰所指出的，這一股力量是由兩群

(35) Ernest Gellner 曾指出民族主義做為政治原則，主張的是政治單位界線與民族單位界線應符合一致。他同時指出：民族主義者所特別無法忍受、違反民族主義原則的一種特殊情形，是政治單位的統治者與做為人口大多數的被統治者分屬不同民族，使被統治者在自己民族區域內受異族宰制。見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就分析上而言，在這些資深本省籍作家的眼光中，日據時期臺灣作家的認同意識與創作目標，主要是因為不滿日本統治違反了上述政治原則、屬於令人無法忍受的異族宰制。因此筆者將這些資深本省籍作家描述的這種認同意識與創作目標，界定為「民族主義的」。



人士所組成：其中之一是黃信介、康寧祥爲首的新一代本省籍政治反對運動人士（黨外），另一群則是以《大學雜誌》爲中心的戰後世代知識份子、青年企業家等。<sup>(36)</sup>這兩群人士同時包括本、外省籍，其共同點是即使不在臺灣出生，也都在戰後的臺灣成長，並接受國民黨體制下的教育。在七〇年代初，當他們開始投身於政治社會改革事務時，大致都在二十幾歲到四十幾歲之間。七〇年代在臺灣社會公共領域中，一波新的、非國民黨官方的日據時期集體記憶建構的一個主要部份，正是由這兩群戰後世代異議人士中的部份成員所進行的。

至於這一波新的集體記憶發展的另一部份建構者，則主要來自戰後世代的文學界人士，包括作家、文學批評家，以及文學史研究者等。他們和上述要求政治社會改革的黨外與《大學雜誌》人士一樣，都深受七〇年代初臺灣外交挫折、國際關係變化的衝擊。這些戰後世代的文學界人士也和他們一樣，對於日本殖民統治的集體記憶建構，都不約而同地集中在臺灣人「抗日」這個議題上。比較而言，提倡政治社會改革的異議份子一般著重臺灣人抗日的政治或社會運動，而文學界人士則專注於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抗日問題。但如本文下面指出的，當時也有戰後世代的政治異議人士回顧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而這顯示他們關於臺灣人抗日的集體記憶建構與其政治社會革新的主張密不可分。本文限於篇幅，因此只能討論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集體記憶建構。

七〇年代文學界的戰後世代成員對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發展的集體記憶建構，正是這個世代成員對「現實」普遍地「覺醒」下的發展。我們可以說，這一波的集體記憶建構是戰後世代的文學作家、批評家與文學史研究者基於當時臺灣歷史情境所激發的強烈中國民族主義情感，在相關的民族／國家集體經驗敘事模式中關懷臺灣社會現實的一種實踐。換句話說，這種新的、非國民黨官方的集體記憶建構，事實上是在國民黨特殊政治與教育體制下（特別是公共領域言論與行動的不自由、中國民族主義的教化、戰前親共文學與歷史文獻的禁絕等情形下）成長的戰後世代建構集體認同的一個重要面向。這裡所謂的建構集體認同，特別是指他們在試圖解決民族／國家困境、追求民族／國家發展時，尋找並確認他們自己所屬世代的歷史位置與意義。

---

(36) 李筱峰，《臺灣民主運動 40 年》（臺北：自立晚報，1987），頁 90。

## (一)一個開端：陳少廷的〈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 與改良主義的集體記憶建構

就在上述吳瀛濤與黃得時的文章發表四、五個月後，亦即一九七二年五月，陳少廷在《大學雜誌》上發表了〈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一文。這篇文章可以說是七〇年代戰後世代重新探究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先聲。<sup>(37)</sup>就在這篇文章發表的過去一年中，臺灣歷經一連串外交挫折的重大衝擊，包括：大專學生的保釣運動從熱烈興起到逐漸平息、國民黨政府退出聯合國而喪失國際上合法代表中國的地位、美國與中共簽訂「上海聯合公報」而開始「關係正常化」、國民黨政府因日本與中共建交而對日斷交等。這一年多以來，《大學雜誌》已由個人或其社內成員聯名發表一系列呼籲國民黨政府進行政治與社會改革的文章。在保釣運動後的兩年左右期間，《大學雜誌》集結了上百位不同背景而具有社會政治改革意識的戰後世代成員，成為臺灣政治社會批判、要求改革的中心。本省籍的陳少廷，當時正擔任這份刊物的社長。<sup>(38)</sup>〈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一文發表前的半年之中——亦即臺灣退出聯合國以來，陳少廷也成為公開倡議中央民意代表（即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與監察委員）全面改選的最主要人物之一，主張這項改造為臺灣內政革新的首要課題。<sup>(39)</sup>

(37) 這篇文章原為陳少廷於同年四月在淡江文理學院的演講稿。見陳少廷，〈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大學雜誌》53（1972年5月），頁18-24。呂正惠指出當時臺灣大學外文系主任顏元叔的〈臺灣小說裏的日本經驗〉一文，認為「七〇年代對日據時代臺灣新文學的公開研討，是由顏元叔開其端的。」見呂正惠，〈日據時代臺灣新文學研究的回顧——七〇年代以來臺灣地區的研究概況〉，《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4（1996年11月），頁146。但顏元叔此文的出版不僅比陳少廷的〈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晚了一年多，而且如傅博所指出的，其中討論的主要是戰後本省籍作家的小說涉及日據時期的被殖民經驗，實與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無直接關係。見傅博，〈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評價問題〉，頁109；顏元叔，〈臺灣小說裏的日本經驗〉，《中外文學》2:1（1973年7月），頁106-121。顏元叔此文修訂後的英文版，見Yen Yuan-shu, "The Japan Experience in Taiwanese Fiction," *Tamkang Review* 4: 2 (1973), pp. 167-188; 修訂版的中譯見顏元叔，〈臺灣小說裏的日本經驗〉，《中華日報》，1973年10月11-13日，並收於楊素緝編，《楊遠的人與作品》（臺北：民眾日報社，1979），頁55-84。松永正義則正確地指出，陳少廷的文章是這時期重新探索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最早的例子」。見松永正義，〈臺灣新文學運動研究的新階段〉，頁35。

(38) 陳少廷生於1932年，臺灣屏東人，臺大法律系畢業，臺大政治研究所碩士，當時為哥倫比亞大學在臺灣的研究員。

(39) 至少在臺灣退出聯合國之前的1971年春，對於中央民意代表機構因成員老化等因素，而使原本法定人數不足問題日形嚴重等，已經可以看到公開的討論。譬如當時外省籍的中國文化學院政治系教授周道濟

在〈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一文中，陳少廷開宗明義地界定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屬於中國民族主義的抗日性質。他說：

臺灣的文壇，在日據的後半期，也曾有過轟轟烈烈的新文學運動。  
這個運動是受到祖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浪潮之影響而產生的。

臺灣新文學運動，在本省的啓蒙運動和抗日民族運動上，均有過重大的貢獻。臺灣新文學運動是臺灣新文化運動的一環，也是臺灣同胞抗日民族運動的一個支流。同時，我們還應該了解的是，臺灣的抗日民族運動，是認同祖國的中國民族主義運動。所以，從大處著眼，臺灣新文學運動可以說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一環，也是五四前後的文學革命的一個支流。(40)（底線為筆者所加）

主張「本維護法統之精神，求不偏倚之計策」而增補一些年輕的新代表、新委員以解決問題。見周道濟，〈我國中央民意代表的新陳代謝問題〉，《東方雜誌》4:11（1971年5月），頁7-10；該文的增修版又刊登於《天聲雜誌》1:3（1971年7月），頁2-7。後者收於廬山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當前國是言論集》（臺北：廬山，1972），頁141-152。同年10月，《大學雜誌》發表十五位社員（陳少廷亦為其中之一）署名的〈國是諍言〉，呼籲國民黨政府進行內政改革。其中批評中央民意代表機構「由於二十餘年的未曾確實改選」，成為「龐大、衰老而且與廣泛大眾完全脫節卻以民意為名的特權集團」，尤其是無法代表四十三歲以下約佔臺灣三分之二人口的年輕一代的民意，而只「在表面上維持了形式上的法統」，因此要求其定期改選。見張景涵（張俊宏）等，〈國是諍言〉，《大學雜誌》46（1971年10月），頁6。同一期的《大學雜誌》上，也登載陳少廷的文章，認為中央民意代表最令人詬病的是已失去代表民意的功能，尤其是未能代表「今天社會的中堅份子——三、四十歲的壯年人」，因此呼籲「在自由地區及海外僑界辦理中央民意代表的全面改選」，以作為全面政治革新的先決條件。見陳少廷，〈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選問題——兼評周道濟先生的方案〉，《大學雜誌》46（1971年10月），頁13-14；收於廬山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當前國是言論集》，頁351-353。就在《大學雜誌》刊出這兩篇文章的同一個月底，臺灣退出聯合國。之後隨著這個外交重大挫折而來的政治革新呼聲中，強化或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成為熱烈討論的焦點。同年12月，陳少廷與周道濟就此問題在臺大舉行公開辯論會，是這段期間對這個問題的不同主張者最受矚目的公開論爭。這場辯論紀錄見臺大法言社，〈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辯論〉，《大學雜誌》49（1972年1月），頁80-89。這篇紀錄前的《大學雜誌》編者按語指出，當時辯論場地的「臺大體育館爆滿，聽眾有三千多人，這是二十多年來從沒有過的盛況。」陳少廷在刊登辯論紀錄的同一期《大學雜誌》上的另一篇文章中說：「改選中央民意代表之議原來也是一個政治禁忌（Political taboo）。廿多年來人們一直諱言之。然而這個在兩年前辦理中央公職人員增補選時尚無人敢公開主張的意見，何以在短短的期間內竟變成人們普遍的要求呢？形勢使然也。」見陳少廷，〈再論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選問題〉，《大學雜誌》49（1972年1月），頁97。臺灣退出聯合國後，各方討論強化中央民意代表機構的過程，參見洪三雄，〈烽火杜鵑城：七〇年代臺大學生運動〉（臺北：自立晚報，1993），第六章。從退出聯合國到1972年3月的五個月左右期間，對這個問題的不同主張各方的討論文獻，見廬山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當前國是討論集》。

(40) 陳少廷，〈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頁18。

接著陳少廷指出，在日據時期「漫長的半個世紀中，臺灣同胞無時不在跟日本統治者作民族鬥爭。」不僅在前期「臺灣同胞不斷以武力抵抗日本異族的統治」，「為炎黃子孫寫下一頁悲壯而光榮的歷史」；而且在後期的非武力抗爭中，「陸續在東京、臺灣、大陸所組成的知識青年的團體」的「宗旨是一致的——解救同胞，歸回祖國。」<sup>(41)</sup>在討論了日據後期從非武力抗日的「新文化啓蒙運動」中產生的臺灣新文學發展過程——隨著一九二二年與一九二三年陳端明、黃呈聰與黃朝琴分別發表〈日用文鼓吹論〉、〈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與〈漢文改革論〉、一九二四年張我軍開始抨擊臺灣傳統文學而來的進展——之後，陳少廷進一步綜結了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發展的「歷史意義」。他再一次指出「臺灣新文學運動是直接受到祖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而產生的，它始終追求五四以後的新文學之傾向，可以說是發源於中國新文學運動的一個支流」，以及指出「臺灣新文學運動始終跟抗日的民族運動有密切的關係，文學作品也均帶有濃厚的抗日的色彩」。此外，陳少廷認為：「臺灣新文學運動，由語言改革（提倡白話文）開始，繼而抨擊舊文學，最後才有新文學的創作。這和中國的新文學運動的過程完全相同。……後起的臺灣新文學運動，必然要走五四的『老路子』」；同時一九二七年後，「臺灣文化協會分裂……左派思想出現，農工民眾覺醒。……臺灣文化界……有一些人走上歧途。這種情形和中國卅年代文藝完全雷同。」<sup>(42)</sup>最後，陳少廷語氣堅定地宣稱：

顯然，臺灣新文學運動也因臺灣光復，重歸祖國而永遠結束了。因為臺灣的文學就是中國的文學，所以再也沒有所謂「臺灣文學」可言了。（「鄉土文學」應當別論）這也就是說，獻身於臺灣新文學運動的先輩，已經光榮地完成了他們的歷史使命。<sup>(43)</sup>（底線為筆者所加）

和前述王詩琅、葉石濤、吳瀛濤與黃得時等日據時期成長的本省籍資深作家在五〇年代中期到七〇年代初期對日據下臺灣新文學的回顧相比較，陳少廷與他們相同的是強調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作家認同祖國、目的在回歸祖國的中國民族主義的抗日傾向，以及其作品做為這種抗日的具體實踐。同時陳少廷也和他們一

(41) 陳少廷，〈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頁18-19。

(42) 同上註，頁24。

(43) 同上註，頁24。

樣，都強調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為中國文學的一部份，並且認為抗日是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發展的動因，甚至是其存在的主要理由；抗日的任務既已結束，那麼光復後本省籍作家與作品自然納入中國文學的範疇，不須再以「臺灣文學」指稱自己的創作活動與成果。亦即如陳少廷所斬截地認為的：「再也沒有所謂『臺灣文學』可言了」。

事實上在他的文章結尾，陳少廷即註明他主要參考的是前述的《臺北文物》那兩次特輯，以及王詩琅、黃得時等人的文獻。然而做為戰後受國民黨體制教育而成長的年輕世代的一份子，陳少廷要比王、葉、吳、黃等在日據下成長的資深本省籍作家，更強調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興起、發展與性質的影響，並且更加突顯當時的臺灣新文學做為五四後中國（新）文學一部份的歷史定位。在將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發展與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連繫起來的過程中，陳少廷展現了比上述資深的本省籍作家更強烈的中國民族主義情感，也比他們更明顯地運用以中國民族主義為中心主題、關於十九世紀中葉後「中國人」、「中華民族」與外國強權對抗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去理解日據下臺灣新文學的「歷史意義」。事實上，正如〈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一文的標題所不言而喻，陳少廷之所以「回憶一下臺灣新文學運動的一些往事」，除了一方面在追念獻身於此的前輩之外，另一方面即在「紀念五四的第五十三週年」。<sup>(44)</sup> 事實上在兩年前的五四運動第五十一週年前夕，亦即一九七〇年初，當時臺灣與日本的釣魚臺主權爭議剛剛開始，《大學雜誌》尚未改組，陳少廷尚未擔任社長，海外與臺灣的保釣運動也還未見端倪，而深受六〇年代中期以來臺灣學術界「現代化」論影響的陳少廷，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即慨嘆近百年來「西方文化的衝擊，使中國發生亙古未有的巨變。」為了解決中國政治、經濟與文化發展落後於西方的困境，他認為「這一代中國智識份子」的志向，是要「繼承五四未竟的任務——中國現代化運動」。陳少廷強調：

建立現代化的中國，無疑是這一代中國智識份子努力的目標。……從西方文化中，我們攝取科學與民主，以滋養、富潤中國文化。現代化的中

(44) 陳少廷，〈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頁18。

國，不僅是科學的中國，民主的中國，更是人本主義與理智主義的中國。(45)

除了更強烈的中國民族主義情感、更清晰的中國民族主義的集體記憶參考架構之外，置身於保釣運動後社會人心對時局感到危疑不安的歷史脈絡中，做為要求政治社會改革的本省籍戰後世代的一份子，陳少廷的〈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回顧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用心強調其做為中國文學的一環、中國民族主義的抗日性質，毋寧比之前資深本省籍作家的緬懷往事，更具有涉及政治社會改革的現實意義。就在這篇〈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發表的四個月前，陳少廷在另一篇主張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的文章中，如此批評持反對意見者的心態：

現在容我明白地說，反對論者的理由，與其是理智的，毋寧是心理的。顯然，全面改選的結果，本省籍的代表必然大量增加。這是應該歡迎的，何須擔心呢？由於腐化的滿清政府在甲午的失敗，割地求和，臺灣遂落於日本異族的統治。本省同胞等於為祖國同胞作了替罪羔羊。然而在被日本統治的漫長的半世紀中，本省同胞不斷地以武力抵抗日本統治者，為中華民族寫下一頁悲壯而光榮的歷史。這證明了本省同胞是最愛國的、最優秀的中華兒女。廿五年來，我們能把臺灣建設成國家復興的基地，政府的領導有方固不待言，但本省同胞的貢獻和犧牲，功也不可沒。所以該讓本省人士在中央政治機構裡有更多的發言權。我們必須深切的體認到臺灣是屬於中國的一部份，而中國的一切，本省人也有份啊！……所以他們〔本省同胞〕都明白，在建國復國的革命大業中，他們肩負著鉅重的時代使命；同時他們更有無比的信心，將不辜負全體中國同胞的重託，支持政府，擁護政府，光復河山，重建中華。

……眼前國家的危機，也正是國家復興的轉機。廿五年來的特殊環境，使臺灣同胞在心理上感到受著「政治歧見」的委屈。尤其是由附匪的陳儀之暴政所造成的不幸事件，使臺灣同胞始終沒有能夠除掉心理上

(45) 陳少廷，〈論這一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志向（代序）〉，收於大學叢刊編委會編，《這一代中國知識份子的見解》（臺北：環宇，1970），頁7-10。

的挫折；而政府今天何須背陳儀暴政之黑鍋呢？正由於時代的背景和政治的情況如此特殊錯綜複雜，執政黨乃始終沒有能夠獲得本省智識份子普遍的諒解。因此，爲了達成團結，改選中央民意代表是刻不容緩之事。我深信，經由全面的改選，必能促成朝野的精誠團結，同時也可以使那些在歧途上的海外本省青年，幡然醒悟，反正歸來；更可杜塞毛共左派份子對我政府的攻訐。在國際上，我們更可一新天下耳目，贏得國際的尊敬。(46) (底線爲筆者所加)

換句話說，七〇年代初一連串外交挫折，加上海外臺灣獨立運動的明顯發展，都威脅到國民黨統治的正當性時，要求國民黨政府進行政治改革，尤其是討論中央民意機構成員的「代表性」議題，不免牽涉到戰後本、外省人政治權利不平等的敏感問題，同時也涉及二二八事件後本、外省人互不信任的複雜關係。因此對陳少廷而言，回顧日據時期的過去，就在於將臺灣人與日本殖民統治的關係納入一個中國民族主義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來理解其歷史意義——或者更明確地說，是對戰後的「我們」的意義。以模式化的方式來界定這種關係——包括臺灣新文學的創作與發展——爲「抗日」（或「不抗日」），並且專注於其抗日（而略去或輕描淡寫「不抗日」）的部份，其最重要的目的，可以說在於證明「本省同胞是最愛國的、最優秀的中華兒女」，因此應獲得做爲祖國代表的國民黨政府之充分尊重與信任，應享有與外省人平等的政治權利。

陳少廷所憑藉以理解日據下臺灣新文學的參考架構，事實上與戰後國民黨政府所建構而在社會公共領域中被視爲合理正當的日本殖民統治集體記憶的基調（尤其是強調臺灣人民與大陸人民血緣上、歷史上、文化上密切的同胞關係、強調臺灣同胞心繫祖國的民族主義精神等要素），幾乎沒有什麼不同。或者我們可以說，回顧日據下臺灣新文學，強調其中國民族主義的抗日性質，對陳少廷而言，主要的目的即在希望這一段文學的過去，能被納入中國民族主義集體經驗敘事模式中的情節，成爲「我們」「中國人」集體記憶的一部份，從而確認臺灣人——包括做爲戰後世代一份子的陳少廷自己——的「中國性」（Chineseness）。這種關於

(46) 陳少廷，〈再論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選問題〉，頁 97-98。

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集體記憶建構方式是「改良主義的」(reformist)，亦即一種企圖將過去臺灣人的文學發展納入國民黨政府接受的中國民族主義集體經驗敘事模式、要求臺灣人的中國性被肯定與承認的行動，而非以另一個不同的民族／國家集體經驗敘事模式取而代之，進而建構截然不同的集體認同，指向較激進的行動方案（譬如獨立建國）。這就像陳少廷對充實中央民意代表機構的看法一樣。雖然全面改選的主張在當時算是相當激進的，但仍然是中華民國體制內要求省籍平等的一種改良主義。換句話說，這種關於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集體記憶建構，也可以視為一種在體制內要求省籍平等的改良主義行動。

陳少廷的〈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發表之後，許許多多戰後世代成員和他一樣，也重新探索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這些年輕世代的成員未必像他一樣，抱持著像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之類的具體政治社會改革主張。但是和陳少廷一樣，他們關於日據時期這段文學往事的回顧，都是戰後世代在七〇年代初之後，以臺灣外交挫折為主的時局變遷中，藉以理解現在、瞻望未來的行動。換句話說，藉著重新探索這一段半世紀之前殖民統治下的往事，這些戰後世代的成員將他們所認知的七〇年代初以來的政治社會情境與這個過去聯繫起來，以理解目前情境的意義，以及當下與未來自我行動的抉擇。同時，與陳少廷一樣的是，他們將過去、現在與未來聯繫起來，使之產生協調一貫的意義，而用來指引他們意識與行動的最重要憑藉，是一個中國民族主義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亦即建構「中國人」、「中華民族」集體記憶的參考架構。這個時期的戰後世代固然回歸臺灣鄉土，關懷本地現實，然而鄉土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現實的意義與對應的行動，主要仍然是放在這個敘事模式下去理解，而非建構一個替代模式（譬如八〇年代後臺灣意識提倡者所從事的）。在公共領域的這個敘事模式理解下，對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而言，日據下臺灣新文學最突出的特徵或最重大的意義，就在於其中國民族主義的抗日性質，以及深受祖國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而成為中國文學的一部份。事實上，我們可以說，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在公共領域再現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其參考架構大致上不出陳少廷一九七二年初〈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一文的範圍。從事後回顧的觀點來看，我們可以說：做為七〇年代戰後世代重新探索這一段文學往事的先聲，陳少廷的這篇文章已經預示了接下來十年左右，這個年輕世代的成員藉著回顧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而建構抗日集體記憶的基本方向。



## (二) 批判現代主義文學與探索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

伴隨陳少廷〈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而來的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探索，夾雜在批判「現代主義文學」、具有強烈社會批判意識的鄉土小說等發展趨勢中，成為「回歸鄉土」文化潮流的主要表現之一。陳少廷在一九七二年五月發表〈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前後，臺灣的文學界也正開始出現對六〇年代以來佔優勢而深具影響的現代主義文學創作——尤其是現代詩——的激烈批評。從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三年間的「現代詩論戰」中，批評者主要指責的是「現代文學，尤其是做為主流的現代詩，在精神上接受了西方現代主義及個人主義的殖民，表現在內容上的便是意識混亂、思想不清、逃避現實。在語言上，仍然晦澀怪誕、朦朧得很，搞詩壇上的方言趣味，開五四文學革命語言工具大眾化的倒車。」<sup>(47)</sup> 這些抨擊雖然針對現代詩而發，但實際上涉及了對文學的存在意義——尤其是對創作者的動機與作品和社會、民族、國家的關係——這種更根本問題的反省。就像當時一位文學批評者所歸納的，對現代詩的責難主要在審察「文學是否為大眾而創作？它的反映和批評是否能造成社會的進步？它到底為我們國家的發展貢獻了什麼？」<sup>(48)</sup> 或者如另一位論者所綜結的，這些抨擊主要在追問「詩人的成就是什麼？在那裡？它在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學傳統中，究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佔了怎樣的位置？它為此時此地生活的我們，究竟作了多少真實而深切的見證？」<sup>(49)</sup> 換句話說，這些批評與反省，都在要求文學必須具有「民族性」與「社會性」。<sup>(50)</sup> 在現代詩論戰中提出上述批評與要求的，基本上也是戰後世代的成員。高信疆當時策畫、主編了被認為是「多年來對現代詩的檢討，盡力最多，做得最好」的《龍族詩刊》〈龍族評論專號〉（1973年7月）。<sup>(51)</sup> 他觀察到：

…… [就在 1972 年]，春雷乍驚般的，我們忽然聽到了來自各種不

(47) 趙知悌，〈序〉，收於氏編選，《文學休走——現代文學的考察》（臺北：遠行，1976），頁1。

(48) 同上註，頁2-3。

(49) 高上泰（高信疆），〈探索與回顧——寫在「龍族評論專號」前面〉，收於趙知悌編選，《文學休走》，頁164。

(50) 關於當時論戰中批評現代詩一方的主要文獻，收錄在趙知悌編選的《文學休走》一書中。

(51) 趙知悌，〈序〉，頁3。

同層次，不同方向的批評及檢討之聲；大家像是一夜之間醒轉來了，正視了現代詩的面貌與內涵。不論學術界、文藝界，甚至詩人自己，都引發了一次長久而普遍的討論……。

……這次的討論與以往任何一次新詩論戰，都有其顯著的不同——它的評論者，幾乎大部份是年輕一代的學者、詩人，或與詩人關係極為密切，對新詩發展一向關懷的學術界朋友……。<sup>(52)</sup>（底線為筆者所加）

本身也是外省籍戰後世代一份子，並且擔任《大學雜誌》社務委員的高信疆，<sup>(53)</sup>進一步以他自己主編的〈龍族評論專號〉為例，指出當時「一個較大的趨勢是——讀者、作者，都共同要求現代詩的『歸屬性』。就時間而言，期待著它與傳統的適當結合；就空間，則寄望於它和現實的真切呼應。」<sup>(54)</sup>這裡所謂的要求現代詩重視「傳統」與「現實」，也就是強調文學要具備「民族性」與「社會性」。這種雙重要求，正是現代詩論戰前後這段期間所興起、通貫七〇年代而成為其時代普遍特徵的「回歸鄉土」文化潮流與社會改革意識所期望實現的。然而就像當時的文學批評家何欣所指出的，「『鄉土』在那裡？也許四千多年的文化太遠太大了罷？所以只好回歸到此時此地的『鄉土』，而且是相當狹義地回歸到民間。」<sup>(55)</sup>對於在臺灣出生、成長而抱持著中國民族／國家認同的戰後世代而言，不分本、外省籍，臺灣實際是他們唯一熟悉的「中國」社會現實。因此關懷臺灣的社會現實，對他們來說，也就在關懷中國，而成為他們中國民族主義實踐的一種方式。高信疆在批評現代詩作者「盲目的捨棄傳統，不承認現實社會」時，曾如此說：

特別是中國。百多年的劫難，帝國主義的侵凌、壓迫，歷史與現實的恥辱，遷徙、流離，創痛至深的百姓小民……我們拿什麼來呵護這塊破碎的大地、這些骨肉親情的同胞？當我們看到溫和良善的中國人民，如何在歷史的重壓下跌倒了，又站起來；如何默默的流血淌汗，不著一語的

(52) 高上泰（高信疆），〈探索與回顧〉，頁162-163。

(53) 高信疆原籍河南，1944年生於西安，畢業於文化學院新聞系。策畫〈龍族評論專號〉出版時，高信疆為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主編。見林惺嶽，《臺灣美術風雲40年》（臺北：自立晚報，1987），頁192-199。

(54) 高上泰（高信疆），〈探索與回顧〉，頁166。

(55) 何欣，〈七〇年代的使命文學：論楊青矗和王拓〉，收於其《中國現代小說的主潮》（臺北：遠景，1979），頁148。

建設了我們這個民族延續千年的文明時，我們心裡的感受是什麼？當我們進入瑞芳的煤坑，走過了蚵寮的鹽村，面對雲林的海難時，我們又當如何慚愧而又警惕於自己筆底的表現呢？當我們想到：就在同樣的時間裡，僅僅一海之隔，我們還有那麼多流著相同血液的父兄子弟，如何被剝奪盡了個人的尊嚴，如何咬緊牙根，含淚帶恨的卑微以生、卑微以死的時候，我們不是不能隨著人家去嬉戲，去笑鬧，去空無晦澀，甚至去瘋狂荒謬，而是，我們何忍？尤其最近兩年，國際環境的轉變，社會結構的更替，更使我們嗅到了一份與往日全然不同的氣息。年輕的一代，已經驚悟到面對現實，接近社會與民族背景的重要；年輕人愈來愈相信，假如我們不愛這塊生我育我的土地，不去認識它，並為它流血流汗辛勤耕耘的話，我們將成為歷史上一群最可悲，也最沒有面目，沒有責任的人了。<sup>(56)</sup>（底線為筆者所加）

換句話說，就像本文前面所提到的，一個強調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近百年中國與外國強權對抗關係的中國民族主義集體經驗敘事模式，是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理解當時臺灣外交政治變化、社會現實問題，以及鄉土文化傳統的主要參考架構。在這個參考架構下，臺灣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於是與中國民族／國家近百年來的命運取得了聯繫，臺灣的「中國性」也就被建構出來。因此在瑞芳的煤坑、蚵寮的鹽村、雲林的海難中——就如同在遙想的中共統治的中國大陸人民中，做為戰後世代代表的高信疆，可以感受到中國民族／國家近百年來的命運，而因此慨嘆不已。<sup>(57)</sup> 外省籍的高信疆這種在臺灣的外交政治變局與社會現實問題中建構——亦即尋找並確認——中國性的行動，就像本省籍的陳少廷在做為鄉土文化傳統的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中建構其中國性一樣，都是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成員在時局的變化中，對原本被教化而內化的中國民族／國家認同與民族主義的充實、具體化 (substantiate)，因而是一種「再辨識」(re-identification) 的過程。<sup>(58)</sup> 事實

(56) 高上泰 (高信疆)，〈探索與回顧〉，頁 168-169。

(57) 林惺嶽曾如此形容幼年來臺的高信疆：「……於大陸淪陷前夕趕上了最後的空軍班機，飛越變了色的山河，來到了臺灣，……置身於百廢待舉的克難年代，高信疆不但與本省子弟打成一片，也承受了戰後臺灣艱苦生活考驗的烙印。」見林惺嶽，《臺灣美術風雲 40 年》，頁 193。

(58) 蕭阿勤，〈民族主義與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頁 91-92。

上，高信疆策畫的〈龍族評論專號〉的內容，在「新詩傳統的回顧」部份，原本除了追溯傳統舊詩與五四新文學運動到一九四九年的大陸新詩發展之外，也預計探討「光復前本省詩壇」，後來因故才作罷。<sup>(59)</sup> 正如高信疆自己所強調的，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對於我們自身傳統和現實的正視」，「不能解釋為一種偏狹的地方色彩或功利主義」，而是「正好相反」，這是「對於自己的中國屬性的再覺悟」。<sup>(60)</sup>

### (三)戰後世代與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探索： 抗日集體記憶的民族化與中國性的再確認

一九七三年八月，屬於外省籍戰後世代的尉天驄等人，<sup>(61)</sup> 延續了自五〇年代末以來編輯或創辦《筆匯》（革新號，1959年5月至1962年3月）、《文學季刊》（1966年10月至1970年2月）與《文學雙月刊》（1971年1-4月）的經驗，再度發刊《文季》，由本省籍而隨後成為重要鄉土小說家的王拓主編。<sup>(62)</sup> 前後僅發行三期的《文季》，具體呈現了回歸鄉土文化潮流在文學領域三方面的主要發展，亦即對現代主義文學的批判、社會批判意識強烈的鄉土小說的出現，以及對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同時包括光復以來持續創作的本省籍作家與作品）的探索。在這份刊物第一期的〈發刊詞〉，清楚地顯示了尉天驄等人經歷七〇年代初的臺灣社會政治劇變後，終於將之前對現代主義文學的反省與不滿呈現為清楚的「現實主義」文學創作主張。<sup>(63)</sup> 同時在這份創刊號上，除了登載唐文標抨擊臺灣（包括香港）

(59) 高上泰（高信疆），〈探索與回顧〉，頁166。

(60) 同上註，頁167。

(61) 尉天驄生於1935年，江蘇碭山人，畢業於政治大學中文系，七〇年代中任教於該系。

(62)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87），頁156。王拓本名王紘久，1944年生於基隆。

(63) 這份〈發刊詞〉說：「當中華民族的命運在這種奮鬥的過程中正面臨史無前例的考驗，全國上下正努力於開創一個新局面的時候，如果還有那麼一種人仍然高蹈於現實之外，以一種貴族的姿態自詡著個人的吟風弄月可以給予人們以永恆的安慰，無疑地那不僅是在自欺欺人，而且也是對藝術的一種姦污了。因此，我們認為文學不但應該是生活的反映，更重要的還是如何透過這些反映在現實中教育自己。」又說：「翻開歷史，我們既然找不到一種自外於自己民族、自外於大多數人、自外於現實社會的藝術，能夠經得起潮流的衝擊；因此我們相信：只有植根於生活之中，以無比的愛心去擁抱這世界的痛苦和快樂，我們的藝術才能同中華民族的命運一樣，在經過漫長的悲愴和掙扎之後，成為安慰眾生的聲音。」見〈發刊詞：我們的努力和方向〉，《文季》1（1973年8月），頁1-2。呂正惠指出，《文季》的同仁是臺灣「第一個現實主義文學團體」。見呂正惠，〈七、八〇年代臺灣現實主義文學的道路〉，收於氏著，《戰後臺灣文學經驗》（臺北：新地，1995），頁56。

現代詩的重要文章之外，<sup>(64)</sup>也刊出了尉天驄、王拓與何欣三人的評論，批判深受現代主義影響的歐陽子的小說。這是對現代詩的抨擊擴展到小說的開端。<sup>(65)</sup>另外，同一期《文季》也刊登了當時另一位戰後世代重要的鄉土小說家黃春明的短篇小說〈莎啞娜拉·再見〉，具體呈現了他在寫作風格上的明顯轉變，亦即從六〇年代後期充滿溫情地描寫鄉間小鎮卑微、苦難的小人物，轉變到七〇年代初具有強烈社會批判意識地剖析城市生活與人物。<sup>(66)</sup>同年十一月，第二期的《文季》刊出「現代中國作家的考察」專輯，一併出現張良澤、史君美（唐文標）、劉若君所撰的三篇文章，討論成長於日據時期、光復後去世的本省籍小說家鍾理和及其短篇小說，並重刊他在一九五九年發表的一篇舊作。<sup>(67)</sup>另外，這一期也登出比鍾理和年長十歲而仍健在的另一位日據時期本省籍小說家楊遠的舊作。<sup>(68)</sup>楊遠與鍾理和事實上隨後成為整個七〇年代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討論中最受重視的兩位作家。<sup>(69)</sup>而《文季》對兩人的討論或舊作的重刊，可以說是開路先鋒。一九七四年八月，第三期的《文季》又登載了林載爵的〈日據時代臺灣文學的回顧〉。和陳少廷一年前發表的那篇短文相比，林載爵的這篇文章，則可以說是戰後世代成員在

(64) 唐文標，〈詩的沒落：香港臺灣新詩的歷史批判〉，《文季》1（1973年8月），頁12-42。

(65) 尉天驄，〈幔幕掩飾不了污垢：對現代主義的考察，兼評歐陽子的「秋葉」〉，《文季》1（1973年8月），頁61-75；王紘久（王拓），〈一些憂慮：談歐陽子的「秋葉」〉，《文季》1（1973年8月），頁76-82；何欣，〈歐陽子說了些什麼〉，《文季》1（1973年8月），頁46-60。同期還有唐文標〈歐陽子的創作背景〉，《文季》1（1973年8月），頁44-45，但並未涉及批判。

(66) 黃春明，〈莎啞娜拉·再見〉，《文季》1（1973年8月），頁97-131。

(67) 張良澤，〈鍾理和的文學觀〉，《文季》2（1973年11月），頁48-59；史君美（唐文標），〈來喜愛鍾理和〉，《文季》2（1973年11月），頁60-76；劉若君，〈鍾理和短篇小說讀後〉，《文季》2（1973年11月），頁77-81；鍾理和，〈貧賤夫妻〉，《文季》2（1973年11月），頁82-90。鍾理和於1915年生於屏東，卒於1960年。1938年至1946年間，鍾理和赴中國大陸東北、北平等地，並開始以中文寫作，後返回高雄美濃定居。如彭瑞金所指出的，「鍾理和雖然也是跨越戰前戰後兩個世代的作家之一，不過，不同的是，他沒有語言的隔閡和障礙，日據時代，他就是中文作家。」見彭瑞金，〈以文學為生命作見證——鍾理和集序〉，收於氏編《鍾理和集》（臺北：前衛，1991），頁9。

(68) 楊遠，〈模範村〉，《文季》2（1973年11月），頁105-142。楊遠本名楊貴，1905年生於臺南，1985年逝世。楊遠曾於1924年至1927年赴日就讀大學，並逐漸受左翼思想影響。返臺後積極參加臺灣文化協會的活動與農民、勞工運動。楊遠在日據時期均以日文寫作，戰後才自學中文並發表中文作品。重刊的〈模範村〉也是日文作品的中譯。七〇年代初，楊遠實際上已停止寫作。見下文的討論。

(69) 呂正惠指出，「就整個七〇年代而論，臺灣文學新『出土』作家中最受矚目的，無疑要數楊遠了」；「在整個七〇年代，鍾理和可能是楊遠之外，最受評論界注目的臺灣『出土』作家。」見呂正惠，〈日據時代臺灣新文學研究的回顧〉，頁148、149。

七〇年代初臺灣的時局變化中，最早較完整地探索這一段文學往事的嘗試。(70) 於是從《文季》第二期發刊的一九七三年底之後，對日據時期的臺灣新文學，包括從日據到光復後仍持續創作的本省籍作家與作品，開始逐漸進入熱烈探索的階段。(71) 從此到七〇年代末，對於一些已去世或仍健在的資深本省籍作家的介紹、評論、紀念專輯、舊作重刊等，或者是概括地談論日據下臺灣新文學的文章、專輯、座談會紀錄等，就不斷地出現在報紙的副刊與文藝或綜合性的刊物上。同時其中一些作家個別作品的專輯或全集，也都陸續整理出版。另外，一些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主要的期刊雜誌，以及相關的報紙，也被複印出版。到了七〇年代即將結束的一九七九年，更出現了兩種卷帙宏富的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作品的選編套書，涵蓋了小說、詩歌、散文，以及當時相關的論說文獻。(72)

如同本文前面指出的，七〇年代隨著陳少廷的〈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之後而來的戰後世代成員對於日據下臺灣新文學的公開探索，其參考架構大致不出陳少廷那篇文章的範圍——亦即一個中國民族主義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一個建構中國人、中華民族集體記憶的參考架構；並且在這個敘事模式或參考架構下，特別強調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認同祖國的抗日性質，以及它無可置疑地做為中國文學一部份的「事實」。因此一九七三年底之後，對於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逐漸熱烈的探索，可以說是一個以戰後世代成員為主，逐漸將這一段殖民時期的文學「中

(70) 林載爵，〈日據時代臺灣文學的回顧〉，《文季》3（1974年8月），頁133-165。當時刊出的只是這篇文章的前半部，後來因為《文季》停刊，後半部無法續登。這篇文章——包括後半部——的完整版，見林載爵，〈臺灣文學的兩種精神〉（臺南：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996），頁137-266。根據這本作者自己編集出版的《臺灣文學的兩種精神》封面扉頁的作者介紹，林載爵為臺南人。1974年發表這篇文章時，正就讀於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

(71) 如呂正惠所指出的，1973到1974年間，包括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作家以及日據到光復後持續創作的本省籍作家、作品的「『出土』重現人間，似乎形成一股風潮，標示著一個臺灣文學研究的新時代的開始。」見呂正惠，〈日據時代臺灣新文學研究的回顧〉，頁148。

(72) 這兩套書是李南衡主編，《日據下臺灣新文學，明集》，五卷（臺北：明潭，1979）；鍾肇政、葉石濤主編，《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八卷（臺北：遠景，1979）。後者在八〇年代初又接著出版四卷：羊子喬、陳千武主編，《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9-12卷（臺北：遠景，1982）。關於1973年底至七〇年代末重新探討日據時期新文學——包括日據到光復後持續寫作的本省籍作家、作品——的詳細發展經過與相關文獻，下列研究者已做了相當清楚的描述，本文在此不再贅述：林梵（林瑞明），〈楊遠畫像〉（臺北：筆架山，1978），第一、八章（關於楊遠的部份）；傅博，〈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評價問題〉；松永正義，〈臺灣新文學運動研究的新階段〉；許俊雅，〈「日據時期臺灣文學」研究概況〉；呂正惠，〈日據時代臺灣新文學研究的回顧〉。

國) 民族化」的過程。雖然將這段過去(中國) 民族化, 並不是從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才開始, 但是七〇年代這個過程的特殊之處, 就在於它主要是戰後國民黨教育體制下成長的年輕世代之生命歷程與這個時期特殊歷史發展交會的結果。或者更明確地說, 在七〇年代, 這一段殖民時期文學的再發現與再度「(中國) 民族化」, 是在這種個人生命歷程與社會歷史過程交會中, 許許多多戰後世代成員藉著辨識、確認這一段過去的中國性而再辨識、再確認他們自己的中國性之表現與結果。在這個特殊的時代裡, 關於這一段過去的集體記憶建構, 如本文前面所指出的, 是與批判現代主義文學、鄉土文學的受重視等交雜在一起, 形成文學方面的回歸鄉土潮流。當時本省籍戰後世代的另一位鄉土小說家陳映真曾精簡地描述這種情形, 並指出戰後世代成員在其中的重要角色。他說:

七〇年代以後, 因著國際政治和國內社會結構的變化, 開始了檢討和批判的時代。「保釣」運動激發了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熱潮, 掀起了社會服務和社會調查運動; 社會良心、社會意識首次呈現於戰後一代的青年之中。在這個變化下, 文學在創作上以現實主義為本質的所謂「鄉土文學」的文學思潮, 展開對西方附庸的現代主義的批判, 提出文學的民族歸屬和民族風格, 文學的社會功能; 在文學史上, 前行代臺灣省民族抵抗文學的再認識和再評價, 使日治時代民族抵抗文學中反帝、反封建的意義得到新一代青年的認識。(73) (底線為筆者所加)

七〇年代初之後, 臺灣的戰後世代成員在政治社會變局中所產生與民族/國家相關的集體身份認同的再辨識、再確認, 其中一個主要的面向即為強烈的歷史感。在開始重新發現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存在時, 戰後世代成員正不斷自我批判對這一段過去的無知, 並且感嘆與上一代歷史經驗的斷絕。一九七七年, 三十幾歲的外省籍大學中文系教授齊益壽與尉天驄共同應邀主講一場座談會。在座談中, 齊益壽首先批評他那一代知識份子在七〇年代以前如何受西化的文化思潮、現代主義文學的影響, 接著他自慚地表示: 「楊逵我是在去年才知道其人, 然後

(73) 陳映真, 〈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 《仙人掌雜誌》1: 5 (1977年7月), 頁78。

看到他的作品，可見我們當時被封閉到何種程度」。(74) 對這一段文學往事的無知，對於與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作家同為本省籍的戰後世代成員來說，尤其感到憾恨。陳少廷在一九七四年主持《大學雜誌》為「紀念臺灣光復第二十九週年」所舉辦的「日據時代的臺灣文學與抗日運動」座談會時，曾經指出「年輕一代的臺籍青年，似乎不很了解它們祖父、父親那一代的歷史，因而造成所謂上下兩代間的『思想斷絕』……。」(75) 在這次座談會中，同樣是本省籍而曾經在一九六三年與吳瀛濤等人創辦「笠」詩社的戰後世代詩人趙天儀，也有類似的焦慮。他說：

……臺灣文學的定義為何？那些作品才算是臺灣文學？我認為臺灣文學應是中國文學的一支，很不幸的是，在日據時期，臺灣的作家必須以異國語言來寫作，這點就構成臺灣文學在中國文學裡比較特殊的成長過程，而這個成長過程卻使我們覺得上一代和下一代有很大的中斷現象，我記得笠詩社的老前輩巫永福先生有一次對我說：「我非常羨慕你們這些年輕朋友，能用這麼好的國文寫作。」這一點對我們年輕一輩的人應是很大的鼓勵。

……我……總是有一種感覺，就是說與上一代斷絕，使得我們在創作上起步時有很多地方必需以〔從〕頭做起，而無法繼承過去傳統的優點，這點我們年輕一代深深感到且迫切需要了解上一代在文學上的成果。(76) (底線為筆者所加)

(74) 齊益壽的發言，見明鳳英紀錄，〈中國文學往何處去？中西文藝思潮座談會〉，收於仙人掌雜誌社編，《民族文學的出發》（臺北：故鄉，1979），頁26。齊益壽生於1938年，籍貫為福建福州，當時為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

(75) 大學雜誌社，〈「日據時代的臺灣文學與抗日運動」座談會——紀念臺灣光復第二十九週年〉，《大學雜誌》79（1974年11月），頁33。

(76) 大學雜誌社，〈「日據時代的臺灣文學與抗日運動」座談會〉，頁31-32。趙天儀生於1935年，臺灣臺中人。這場座談會舉辦的三個月前（1974年7月），趙天儀才因為「臺大哲學系事件」而被解除該系教職。保釣運動以來，國立臺灣大學校園內部分學生與教授批判政治社會事務的言論與活動一直相當熱絡。這個事件可以說是國民黨政府對臺大校園此種發展的壓制。關於當時臺大校園內的這種發展與這個事件，見趙天儀編，《臺大哲學系事件真相——從陳鼓應與「職業學生」事件談起》（臺北：花孩兒，1979）；洪三雄，《烽火杜鵑城：七〇年代臺大學生運動》；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含《附冊》）（臺北：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1995）。1964年3月，十二位本省籍詩人，包括吳瀛濤、陳千武、林亨泰、錦連、白萩、黃荷生、趙天儀等，組織了「笠詩社」，並隨後發行《笠詩刊》。



同樣地，陳映真慨嘆戰後世代「知道賴和、楊逵、呂赫若……的文學青年，絕無僅有」；<sup>(77)</sup> 他因而強調：「對於臺灣先行代民族抵抗作家的再認識和再評價，無疑地將成爲新一代在臺灣的中國文藝家最好的教材，承傳這一偉大而光輝的傳統，發揚而光大之。」<sup>(78)</sup>

在一九七三年底對日據下臺灣新文學的探索逐漸熱烈之後，戰後世代成員將這一段殖民時期的文學往事——以及七〇年代臺灣的變局、自我在這個特殊歷史情勢中的處境和回應——放到一個強調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國與外國強權對抗的中國民族主義集體經驗敘事模式中去理解，可以說是屢見不鮮、極其普遍的現象。譬如當時在推動文學的回歸鄉土潮流中扮演相當重要角色的尉天驄就曾如此表示：

到臺灣一晃就二十多年了，每逢記起中學國文課本中的「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的詩句，總覺得臺灣中國文學在近百年的中國歷史上有著特殊的意義。臺灣的割讓顯示出中國封建社會腐爛的面貌，臺灣被日帝佔領顯示出國際帝國主義的殘暴。如果說近百年來的中國文學建立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礎上，在臺灣的中國文學正是最好的一個代表。它不僅反抗外來的敵人，還必須反抗內在的敵人。最近出的「張我軍文集」，有一篇「糟糕的臺灣文學界」，指的就是在帝國主義腐蝕下的頹廢作品。所以，在帝國主義壓榨下，在臺灣的中國文學有兩個層面，一種是反抗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文學，一種是臣服於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文學。

臺灣光復了！二十幾年來各方面都呈現著一片繁榮，然而就在這繁

---

同年稍早，在日據時期開始文學生涯的吳濁流（1900-1976）也創辦了《臺灣文藝》。此後《笠詩刊》與《臺灣文藝》這兩份刊物成爲大多數本省籍作家——包括在殖民時期成長者與戰後世代——投稿的園地。從八〇年代下半葉起，這兩份文藝刊物的許許多多作家與文學批評者由於歷經美麗島事件後政治局勢的影響，成爲推動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主力。參見筆者的研究：蕭阿勤，〈一九八〇年代以來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A-chin Hsiao（蕭阿勤），*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Chapter 4。巫永福在六〇年代後期加入笠詩社。其相關生平，參見下文的簡介。

(77) 陳映真，〈孤兒的歷史·歷史的孤兒：試評「亞細亞的孤兒」〉，收於氏著，《孤兒的歷史·歷史的孤兒》（臺北：遠景，1984），頁95。

(78) 陳映真，〈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頁74-78。

榮之中，我們看到受到工商業高度的影響，有一股文學的逆流在不斷地發展著，那就是以頹廢、敗北、逃避為主調的現代主義。臺灣雖小，但卻代表著五千年中國文化奮鬥的方向，我們希望大家都發揮個人的力量，替這一時代留下歷史的記錄……。<sup>(79)</sup>（底線為筆者所加）

然而不只外省籍的尉天驄如此，本省籍的戰後世代成員亦然。譬如在七〇年代最早討論鍾理和及其作品，而「對臺灣文學研究具有開創之功」<sup>(80)</sup>的張良澤，在隨後對楊逵與其作品的探討中，即如此描述他的心路歷程：

只緣愛鄉土的一腔情懷，從早年愛慕祖國五千年文化的覺識，遁入五十年間受日帝統治的臺灣文學，企圖找尋承繼中國新文學的命脈，以告來者：自大陸變色後斷了的「根」，早已深植於臺灣泥土中。

臺灣鄉土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流，這一支流始自明末志士的慷慨悲歌，中經清人的安撫教化、抗日鬥士的愛國愛種，乃至國民政府遷臺後的詩禮文教，汨汨涓涓，匯為巨河，歷經百世，不可遏止。

其中，尤以日據五十年間，既受異族迫害，又受第一次大戰後世界新思潮的影響，以及國父革命運動、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激盪，益發形成臺灣文學的多彩多姿：既有新舊文學之爭，又有「叛逆」與「御用」之別。

時過境遷，後人應或會體諒當年「御用作家」之不得已；但在同樣環境之下，堅持漢魂的「叛逆作家」，則如疾風勁草，令人肅然起敬。因此，我一生中要研究的對象，便是這些有骨氣的作家：賴和、楊逵、吳濁流、張文環、張深切、呂赫若、鍾理和。

……

近年來，……相繼多人討論日據時代的臺灣文學，使我有機會發表多年來的研究心得，似乎也在學院裡造成一股研究風氣。值此臺灣光復三十週年，環顧臺灣各方面的建設在政府領導之下，已有令人刮目相看

(79) 尉天驄，《路不是一個人走得出來的》（臺北：聯經，1976），頁175-176。引文中提到的是：張光直編，《張我軍文集》（臺北：純文學，1975）。

(80) 呂正惠，〈日據時代臺灣新文學研究的回顧〉，頁147。

的進步，而三十年來文學的成長，亦是有目共睹，不必我多言。至於光復以前五十年間的慘痛記憶，則是不堪回首，現在僅以楊逵一人作為我研究的七位作家之代表，以為國人在日據時期以文藝反侵略反暴虐之部份記錄。<sup>(81)</sup>（底線為筆者所加）

一旦一個中國民族主義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成為建構這一段殖民時期文學往事的集體記憶之主要參考架構，整個日據下臺灣新文學或者被籠統概括地描述為全部具有認同祖國的抗日性質——譬如前面提到的陳少廷的描繪，或者被武斷地區分為抗日的或不抗日的——就如上面尉天驄與張良澤對「反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文學」、「臣服於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文學」或「叛逆」、「御用」的二分法。不管是在籠統的概括或是簡單的二分法之下，「抗日」都成為許多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作家與作品最突出的特徵，或是最主要的意義和價值。譬如被尊稱為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之父」的賴和，被認為是「一位反日民族解放的戰士」；<sup>(82)</sup> 而「批判與反抗的精神，正是日據下臺灣新文學的特點，也是歷史轉折下，文學所背負的使命」，「這種文學精神的形成，實以……賴和為先驅」。<sup>(83)</sup> 以小說《亞細亞的孤兒》為代表作的吳濁流，其作品則被認為「紀錄中華民族抵抗帝國主義的精神和心靈的歷程」。<sup>(84)</sup> 一九三四年主導成立「臺灣文藝聯盟」、發刊《臺灣文藝》雜誌的張深切（1904-1965），被認為「『徹底的民族主義者』是他最光輝燦爛的一面」。<sup>(85)</sup> 早逝的詩人楊華（1906-1936），則是「像大多數的抗日志士一樣」的作家。<sup>(86)</sup> 至於臺南「鹽分地帶文學」的主要人物吳新榮（1907-1967），被譽為「熱血愛國詩人」。<sup>(87)</sup> 另外，又譬如在東京參與成立「臺灣藝術研究會」，並於一九三三年發

(81) 張良澤，〈不屈的文學魂——論楊逵兼談日據時代的臺灣文藝（四之一）〉，《中央日報》，1975年10月22日，收於楊素娟編，《楊逵的人與作品》（臺北：民眾日報社，1979），頁209-211。張良澤1939年出生於埔里，在彰化長大，1972至1978年間任教於成功大學中文系。

(82) 王曉波，〈臺灣新文學之父——賴和與他的思想〉，收於氏著，《被顛倒的臺灣歷史》（臺北：帕米爾，1986），頁134（原載於《臺灣時報》，1979年4月26、27日）。

(83) 林邊（林載爵），〈忍看蒼生含辱——賴和先生的文學〉，收於李南衡主編，《日據下臺灣新文學，明集1，賴和先生全集》（臺北：明潭，1979），頁458。

(84) 陳映真，〈孤兒的歷史·歷史的孤兒：試評「亞細亞的孤兒」〉，頁95。

(85) 林載爵，〈黑色的太陽——張深切的里程〉，《夏潮》3:3（1977年9月），頁70。

(86) 林載爵，〈黑潮下的悲歌：詩人楊華〉，《夏潮》1:8（1976年11月），頁65。

(87) 張良澤，〈吳新榮先生傳略〉，《大學雜誌》105（1977年3月），頁20。

行《福爾摩沙》文學刊物的巫永福（1913-），其詩作如〈祖國〉等，被認為是代表了「一生一世還是以回到祖國的懷抱為宿願」。<sup>(88)</sup>

在批判現代主義文學、重視鄉土文學、重新探索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文學回歸鄉土潮流中，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楊青矗、王拓等戰後世代的鄉土小說家與作品，以及日據下的臺灣新文學，也在中國民族主義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中被關連起來。譬如一位文學批評者在討論一九三〇年代初臺灣作家關懷臺灣社會現實的「鄉土文學」以及用「臺灣話」寫作所引起的論爭時，認為「當時無論正反兩派，都是立於中國大民族的立場，反對外來殖民文化的侵蝕同化，這也是當時最為凜然不可犯的文學精神所在。」<sup>(89)</sup> 這位文學批評者進一步強調：

日據時代這一場歷時二年多的「鄉土文學」論戰，雖然沒有什麼結論，但論戰的雙方所共同表露出來的反對外來殖民文化的侵蝕同化，強調自尊自重的民族精神，則不能不說對光復以後新成長的如今在四十歲上下這一代的作家，如王禎和、黃春明、陳映真、楊青矗、王拓等人，有相當程度血緣上的關係。這些作家，雖然在成長的過程中有的曾經迷失在外來的炫目的文化中，但為時甚短。在短暫的迷失之後，都能迅速自我糾正，落根於民族的土壤。這樣，就使他們的作品，跟一些長期糾纏在過客心理、移民心理中的作家的作品，呈現出頗不相同的風味。或許就是因為這樣，他們才被稱為今天的鄉土作家吧？<sup>(90)</sup>（底線為筆者所加）

事實上，七〇年代陳映真等戰後世代主要的鄉土小說家，也以如此集體記憶的參考架構將他們自己的文學創作與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連繫起來。譬如陳映真認為，「中國文學，……從東北作家的『八月的鄉村』一直到臺灣作家 [黃春明的]『莎啞娜拉·再見』、[王禎和的]『小林來臺北』，便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奉仕於中國反對帝國主義的巨大民族主義運動的文學作品。」<sup>(91)</sup> 又例如對王拓而言，

(88) 李魁賢，〈巫永福詩中的祖國意識與愛國意識〉，收於丘為君、陳連順編，《中國現代文學的回顧》（臺北：龍田，1978），頁126。

(89) 齊益壽，〈鄉土文學之我見〉，收於尉天聰編，《鄉土文學討論集》（臺北：遠流，1978），頁587-588。

(90) 齊益壽，〈鄉土文學之我見〉，頁588-589。

(91) 石家駒（陳映真），〈在民族文學的旗幟下團結起來〉，收於仙人掌雜誌社編，《民族文學的再出發》（臺北：故鄉，1979），頁226。

「從日本殖民時代到抗日戰爭勝利這段時間內，在臺灣的中國文學」是「典型的臺灣鄉土文學」；它們在精神上表現出「反帝、反封建、反壓迫的民族精神與社會正義」，「並且也是與祖國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所展開的反帝國主義侵略和反國內封建剝削的一切運動相一致的。」<sup>(92)</sup> 至於楊青矗則強調，「臺灣的鄉土文學，最早可以追溯到日據時代的楊逵、賴和等本土作家」；而「臺灣光復」二、三十年之後，真正生根在臺灣這塊土地之上的新生代已經長成，它們要撰寫這塊土地，要描寫這裡的愛與恨」。<sup>(93)</sup>

#### (四)楊逵：抗日英雄作家與戰後世代

當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成員以中國民族主義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做為他們理解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主要參考架構，並且經常以籠統概括或簡單二分的方式建構「日據時期臺灣作家與作品是抗日的（即使有極少數不抗日的作家與作品）」集體記憶時，楊逵在這個集體記憶建構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如前所述，楊逵是七〇年代對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重新探索中，最受重視的一位作家。在這段期間，楊逵所享有尊榮，以及被談論的程度，不僅遠非其他日據時期的臺灣作家可比，而且也遠超出當時被重視的程度僅次於他的鍾理和。我們可以說，在戰後久經冷落的楊逵在這時期聲譽的突起，充分代表了七〇年代初以來臺灣特殊政治社會變化的歷史發展與戰後世代的生命歷程交會的結果。亦即此時楊逵的忽享令名與廣受重視，是在國民黨教育體制下成長的戰後世代成員以中國民族主義集體經驗敘事模式建構關於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集體記憶的結果之一，是這個世代的部份成員在這個特殊的歷史環節中再辨識、再確認他們自己的中國性的一種效應。

首先，楊逵的作品雖然很多，包括小說、散文、戲劇、評論、歌謠等，但自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文季》重刊他的一篇短篇小說舊作開始，他在七〇年代為人傳誦的，大致上集中在幾篇日據時期與戰後初期的短篇小說。這幾篇作品的主題都圍繞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人所受的控制、欺凌、剝削與不平等待遇，並藉著

(92) 王拓，〈廿世紀臺灣文學發展的動向〉，收於氏著，《街巷鼓聲》（臺北：遠景，1977），頁84-85。

(93) 楊青矗，〈現實與文學〉，收於丘為君、陳連順編，《中國現代文學的回顧》（臺北：龍田，1978），頁229-230。

其中的人物傳達作者對自由與平等社會的渴望。因此，這些作品都明顯地具有批判日本殖民統治的意味。<sup>(94)</sup> 在《文季》最早重刊楊逵的舊作時，《文季》的編者就曾在這篇舊作前加了一個按語，認為楊逵在作品中表現的精神與內容，「直接繼承了當時祖國在長期反抗日本侵略所表現的堅毅不屈、沈著勇敢的偉大傳統」。<sup>(95)</sup> 在一篇七〇年代初最早將楊逵與鍾理和兩人相提並論的文章中，林載爵也認為楊逵及其作品代表臺灣文學中剛強、衝撞的「抗議精神」。<sup>(96)</sup>

另外，和楊逵作品中較顯豁的「抗日」性質相關的，是他做為「本省老作家之中，唯一在日據時代直接參與民族解放運動」者這個事實。<sup>(97)</sup> 從中國抵抗外國強權欺凌的敘事模式來看，楊逵不僅以文學作品「抗日」，而且更能以實際行動抗日，對戰後世代成員來說，自然擁有其他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作家無法匹配的地位——即使這些其他作家也被認為是抗日的。正因為這種被認為難能可貴的實踐，使尉天驄尊崇他為「日治時代最具民族精神的本省籍作家」；<sup>(98)</sup> 而張良澤則認為「抗日作家群中，最為『愚勇』的，莫過於楊逵」。<sup>(99)</sup> 張良澤是七〇年代初最早重探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戰後世代成員之一，並且曾決定「畢生以研究臺灣鄉土文學為職志」。他在當時就強調：「研究楊逵無疑是我最重要的目標之一」。<sup>(100)</sup> 因為戰後世代成員認為他結合了文學創作與實際行動的抗日，因此賦予楊逵許多尊稱，譬如日據時代「文化界偉大的巨人與鬥士」、熱愛祖國的「臺灣人民的老英雄」等。<sup>(101)</sup> 也因此楊逵小說中一些明顯的限制——譬如簡單的技巧、平淡的文

(94) 這些大致上就是收錄在下面這本書的幾篇：張良澤編，《鵝媽媽出嫁》（臺南：大行，1975），其中包括〈鵝媽媽出嫁〉、〈種地瓜〉、〈無醫村〉、〈萌芽〉、〈送報伙〉、〈模範村〉、〈春光關不住〉共七篇。這本書後來重新發行為：楊逵，《鵝媽媽出嫁》（臺北：民眾日報社臺北管理處，1979）。

(95) 《文季》，（1973年11月），頁105。

(96) 相對地，林載爵認為鍾理和及其作品代表臺灣文學中包容、沈靜的「隱忍精神」。見林載爵，〈臺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逵與鍾理和之比較〉，《中外文學》2:7（1973年12月）。不過當時的張良澤並不同意將鍾理和作品的精神詮釋為「隱忍」，他認為「鍾理和不但作品的意識型態上，表現強烈的民族精神；且在實際行動上，也表現勇於參與、爭取立場的積極面。」見張良澤，〈鍾理和作品的日本經驗與祖國經驗〉，《中外文學》2:11（1974年4月），頁34-35、56。

(97) 葉石濤，〈楊逵的「鵝媽媽出嫁」〉，《大學雜誌》87（1975年7月），頁33。參見本文「註68」對楊逵生平的簡介。

(98) 林梵（林瑞明），《楊逵畫像》（臺北：筆架山，1978），頁198。

(99) 張良澤，〈序論〉，收於楊逵，《鵝媽媽出嫁》，頁1。

(100) 同上註，頁1。

(101) 分別見楊素娟編，《楊逵的人與作品》，頁176、228。

字、類型化的角色、固定的情節與結局等，反而被特意迴護，認為是中國文學的傳統特性，或是表現強烈的社會意識與關懷同胞之情所不可避免，甚至是值得讚揚的。(102) 換句話說，對這些戰後世代成員而言，如果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由於是抗日的而具有確切明白的中國性，那麼楊逵無疑是這個中國性最堅強的代表。

除了楊逵的作品及其生涯中被確認的抗日因素之外，楊逵在七〇年代享有令名——尤其是被戰後世代成員所特別崇拜——的另一個更重要的因素，是這個或許看似簡單的事實——當時他仍健在。對於在時代變局中感到焦慮與徬徨的戰後世代成員而言，他們在內化的中國民族主義集體經驗敘事模式中嘗試著接續上一代的歷史經驗，企圖從這些過去來理解目前的處境，並且尋找未來的行動方針。在這種情況下，恐怕再也沒有什麼比一個屬於鄉土、屬於上一代而仍活生生的抗日典範更令人雀躍欣喜的。對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成員來說，楊逵的重要性，不只因為他是抗日的、是「最抗日」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仍健在、是活生生的，是可以親身接近與領教的。當時戰後世代成員對楊逵的描述，譬如：「被人掘出的古墟，一座具有歷史價值的古墟」、「一頁真實活著的近代史」、「一部活生生的近代史」、「自身就是一部活的臺灣近代史的抗日名作家」、「碩果僅存的抗日作家」等，都充滿這種對他仍健在而可以親炙的興奮。(103)

在一九七五年左右開始，本省籍戰後世代成員的林瑞明，為了深入瞭解楊逵的生活，「試圖通過一個活生生的人，來省察他身處的時代，重建歷史的一些斷

(102) 譬如溫美玲認為：「楊逵的小說，以今日的眼光來批判，其中所表現的技巧形式或許簡單笨拙，所運用的文字或許粗淺平淡，然而，定雲止水之中，有鳶飛魚躍之勢，字裡行間所表現的知識份子強烈的社會意識，使人感到一股莫之能禦的浩然之氣！」見溫美玲，〈鐵肩擔道義的楊逵〉，收於楊素娟編，《楊逵的人與作品》，頁176；梁景峰則認為：「的確，楊逵的小說沒有很曲折的故事，沒有很錯綜心理的描寫，小說人物的角色過於類型化，故事發展也太固定，結局總有一個歷史規律的方向。的確，文學的類型和統一化是藝術的缺點，看起來是為政治理想宣傳的作品一樣。但是事實上，這種文學作品人物的類型化不正是中國文學，尤其是中國戲劇的傳統特性嗎？而且假如我們仔細思考，這個缺點不也隱藏著一個優點嗎？因為：為什麼作家不應該用清楚的語言向多數人說話？為什麼不應該表現苦難中同胞愛情的溫暖？為什麼作家不應該寫出他們的力量和希望，指出走向光明的方向？難道要沈溺在『自主的藝術王國』裡，自我限制的苦悶圈子裡，永遠『知而不言，言而不盡』，以影射和隱喻的技巧自我陶醉嗎？」見梁景峰，〈春光關不住——論楊逵的小說〉，收於楊素娟編，《楊逵的人與作品》，頁258。

(103) 這些描述，分別見楊素娟編，《楊逵的人與作品》，頁119、128、178、179、201。

層」，曾經與當時在臺中經營「東海花園」的楊達朝夕相處一年。<sup>(104)</sup>在一九七七年發表的〈楊達畫像〉中，林梵指出，自從《文季》等刊物重載並評介楊達的舊作之後，「大陸來臺……以及年輕的讀者，才有機會接觸楊達完整的作品，並對他的文學活動有了初步的認識。從這個時候開始，一向冷冷清清的東海花園，漸漸有人走動。」而「年輕的朋友除了欣喜之外，更希望來到花園，從生活中磨練自己，充分體會楊達的精神」。<sup>(105)</sup>一九七五年中，楊達的短篇小說〈壓不扁的玫瑰花〉（原題為〈春光關不住〉）因「富於民族意識」<sup>(106)</sup>而被國立編譯館選入國中課本。此後許多國中師生由於認為楊達的作品使他們「可以接觸到臺灣史的片段」，更陸續造訪他。<sup>(107)</sup>在促銷一本楊達及其作品的評論集時，當時的出版商在略顯誇張的廣告詞上如此說：「在本省籍的老作家當中，沒有比楊達更當得上『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稱譽了。他的文章大氣磅礴擲地有聲，是最早享譽國際的名作家，如今住在臺中東海大學旁邊經營『東海花園』，自耕自讀自寫，已經成為年輕人『朝聖』的對象。」<sup>(108)</sup>又說：「住在東海大學旁邊有一個老人，他白天挑水澆菜澆花，夜黑提筆寫文章，經常有一些年輕人來拜訪他，說是『朝聖！』，一提到東海馬上就會想到這個老人，給他寫信都不必寫門牌號碼，只要寫他的名字就行了。他就是作家楊達，一身傲骨，擲地有聲，跟他大氣磅礴的文章一樣……。」<sup>(109)</sup>正是從這樣一位挑水澆菜、剪花拔草而其貌不揚的普通老人，同時又是活生生的愛國抗日典範身上，許許多多不斷造訪東海花園的戰後世代成員領略到他們用心追尋的那個過去，體會那種把自己與自己所屬的時代和過去連繫起來而產生的感動，並感受由此激起的對眼前處境和未來的信心。一位戰後世代成員望著來回於花圃行列間工作的楊達，在黃昏夕陽中凝視著他的背影，如此細緻地描述他的感受：

(104) 林梵（林瑞明），《楊達畫像》，頁 295。

(105) 林梵（林瑞明），〈楊達畫像〉，《仙人掌雜誌》1:3（1977年5月），頁 246、260。林瑞明對楊達及其作品的這些記述與評介，後來出版為《楊達畫像》。林瑞明生於 1950 年，當時在東海花園與楊達相處時，正就讀於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106) 見林梵（林瑞明），〈楊達畫像〉，頁 261-262 所引當時在國立編譯館服務的寒爵給楊達的信。

(107) 楊達，〈後記〉，收於其《鵝媽媽出嫁》，頁 212。

(108) 楊素緝編，《楊達的人與作品》，書後對該書（「民眾文叢 L-10」）的廣告詞。

(109) 同上註，該書封底的題詞。



過去雖已過去，但了解蛻變的歷程是必須而且有其意義的。從過去的事實了解未來的可能，追求希望與理想。——他們老一代作家，多已凋謝，仍存在的也都年近古稀，楊達先生即是。

一個健在的老人是一頁真實活著的近代史；初見著他時，心境是好奇、驚訝與迷惑的；到底那個孕育他思想的時代不是我了解的，在時間逝去褪變後是複雜而難懂的。……

……感到自己的年輕亦沒有他的積極和奮鬥，想及這個時代的徬徨迷失，固然是變動的過渡現象，卻似乎也失去對未來的信心，沒有皈依的苦悶。他的表現是不惑於時代，對於理想的執著和追尋；或理想是永恆的，他給予的了解是我們迷惑失去的不是別的，是信心；對於未來的自信，則沒有不能的事。來往的人們或是好奇的路過或是有心的，他們不會忘記的是他真實的存在，這不是那些遠而不可近的偶像可以比擬的。我們的時代缺失的或是和我們同在奮鬥而可親近的人物，同情的和群眾一起；在離去時不會忘記的是一個親近和易的老人，他的往事的鄉愁和對未來的盼望。<sup>(110)</sup>（底線為筆者所加）

另一位也如此懇切而生動地抒發他藉著楊達而將自己所屬的時代與世代和過去連繫起來所產生的興奮：

看起來，以前他這一代的生活、奮鬥、苦難和憧憬已經離我們這麼遠，他們不願再談起過去那些沒有勝利的掙扎，而我們也沒有去考查，去認同這段歷史，因此我們和他們之間文化意識的代溝是如此大。……他們過去的時代又離我們這麼近，他們奮鬥的理想對我們今天應當更可貴、更迫切才對。事實上，他們也活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也多少擁有他們的時代，中間並沒有時代的界線。一個民族有多少生命，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都有新生命誕生，每一時每一刻都有不同年齡的人在生活在成長，沒有空隙可以造成世代的區別。因此他們並不是已經成為過去，

(110) 林尹文，〈耕耘者楊達〉，收於楊素編，〈楊達的人與作品〉，頁127-130。承蒙本文匿名審查人之一告知：林尹文本名林瑞文，1952年生，當時就讀於中興大學。

他們還是我們同時代的朋友，並肩走路、一起呼吸、一起生存的朋友！

(111) (底線為筆者所加)

換句話說，親炙楊遠這樣一位近在眼前、活生生的抗日人物典範，讓許多戰後世代成員真切地領略到將「我們民族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連繫起來而產生的興奮、感動與信心。然而這種激動的情感並非產生於真空中、可以朝任何方向自由流竄而不受牽引。它們實際上既是「歷史的」，又是「政治的」，亦即當時戰後世代成員重新發現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親炙楊遠而來的心靈激盪，事實上受著他們在國民黨教育體制下或家庭內被教化的中國民族主義集體經驗敘事模式所引導——或者更正確地說，是由於內化了這個獨特的集體記憶的參考架構，藉著它去理解社會與自我，才有如此特殊的興奮與感動。楊遠做為一位抗日的人物典範，具體化了這些戰後世代成員原本被教化與內化的百年來中國民族／國家對抗外國強權的集體記憶。在連繫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過程中，這些戰後世代再辨識了他們的中國民族／國家認同，喚起那做為苦難的民族／國家集體一份子的悲慨與激動。(再) 確認為自己民族／國家集體的一份子時，不僅這個集體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已不可分，自我與他人也混為一體，因為大家都是這個集體生命的一部份。對這些戰後世代成員而言，時代與世代的界線，就如前面的引文所表現的，可以說不再重要——因為大家都是祖國的兒女、中華民族的一份子。Benedict Anderson 所謂民族做為「想像的政治社群」，<sup>(112)</sup> 不僅跨越空間，涵蓋了當代的民族同胞，更超越了時間，包羅了先來、後到者。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正是想像力馳騁的天地，是創意與雄辯 (rhetoric) 結合的結果。

然而在七〇年代回歸鄉土的文化潮流中稱頌楊遠的，不止是戰後世代的成員，而是同時包括了本、外省籍的上一代。譬如葉石濤就強調楊遠在作品中發揚民族意識，表達了追求民族解放的願望，並且「始終從事民族抵抗運動」；回顧這一位「心懷崇高的抱負，不屈不撓地追求光明」的作家的生涯，葉石濤愴然地表

(111) 梁景峰，〈春光關不住——論楊遠的小說〉，頁 259。梁景峰在 1944 年生於屏東縣高樹鄉，1973 年起任教於淡江文理學院（今淡江大學）德文系。

(112)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 and extended ed. (London: Verso, 1991 [1983]).

示「禁不住有一股欲哭無淚的哀傷猛然湧上心頭」。(113) 至於外省籍的資深作家朱西寧（1927-1998）在描述他特地拜訪楊逵時的心情，則說「對這位心儀已久的前輩作家，我都不知是怎麼會懷揣著那份虔敬」。對於這位「剛然的義者」做為「祖國的孤兒」之一而抵抗異族的經歷，朱西寧在字裡行間流露崇高的敬意。(114) 另外，同樣是外省籍的胡秋原（1909-），在為當時楊逵的一本散文與小說合集作序時，談到他直到一九七五年楊逵的小說舊作結集出版，「才知道有這樣一個有真純的民族愛心的作家」。胡秋原強調，這位「樸質的老戰士」、「愛國的作家」所寫的，是「日本的殖民主義的統治下被侮辱、被損害的中國人的生活」；而「這不僅是臺灣中國人生活之象徵，也是大陸中國人生活之象徵。楊逵作品之價值，即在於此。」(115)

### (五)探索鄉土過去：日本殖民統治下成長世代的重新加入

事實上，到了七〇年代，在主要是戰後世代成員所推動的回歸鄉土文化潮流中，當年輕世代成員致力於探究那段他們所不曾親身經歷的文學往事時，那些在七〇年代之前曾經斷斷續續以文字記述這一段過去的本省籍上一代成員，也延續他們之前對親身參與過的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追念，加入這些戰後世代成員重新探索鄉土過去的行列。一九七七年五月，亦即在「鄉土文學論戰」發生的三個月前，陳少廷編撰了《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出版，成為戰後臺灣第一本較全面地論列日據下臺灣新文學發展的專書。這本書對於當時臺灣新文學作家認同祖國、其作品的中國民族主義的抗日性質、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對臺灣新文學發展的影響，以及臺灣新文學做為五四後中國（新）文學支流等的詮解，與五年前的〈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完全一致，全書可以說是這篇文章的擴大與延伸。(116)

(113) 葉石濤，〈楊逵的「鵝媽媽出嫁」〉，頁33-35；葉石濤，〈從「送報伙」、「牛車」、到「植有木瓜的街鎮」〉，《大學雜誌》90（1975年10月），頁63。

(114) 朱西寧，〈謁老園丁〉，《中外文學》3:8（1975年1月），頁18-19。

(115) 胡秋原，〈胡序——談楊逵先生及其作品〉，收於楊逵著，《羊頭集》（臺北：輝煌，1976），頁4、8、9、11。

(116) 事實上這裡所指出的這篇早期文章中界定日據下臺灣新文學的中國民族主義性質的段落，都被納入後來這本專書的「引言」與第七章，而僅僅做了一些文字的改動。見陳少廷，《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臺北：聯經，1997），頁9-10、161-165。

在這本書的「自序」中，陳少廷更直接明白地宣稱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作品「也可以說是一部臺灣同胞的自由奮鬥史。尤其在異族的殖民統治下，這些知識份子所表現的熱愛鄉土故國的民族精神，特別令人欽佩！」<sup>(117)</sup> 事實上陳少廷的這本書和他的〈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一文類似，也大量依賴親身參與日據下臺灣新文學活動的資深本省籍作家在戰後的回顧性文獻，尤其是以黃得時於五〇年代中期發表在上述《臺北文物》特輯中的〈臺灣新文學運動概觀〉一文為骨幹。黃得時在審閱該書後為它作序，認為這本書「把光復前的新文學運動情形作一次鳥瞰，敘述得很扼要而清楚。令人一讀，對於該時期的文學運動，可以得到明確的輪廓。」<sup>(118)</sup>

這本書出版後幾個月，在鄉土文學論戰期間，隨即獲得葉石濤撰寫書評加以讚揚。除了與陳少廷類似，認為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運動是屬於抗日民族革命運動最重要的一環，同時也是中國大陸反帝反封建的三民主義革命運動的一部份」、「一開始就帶著濃厚的民族文學色彩」之外，葉石濤也指出七〇年代初以來「接二連三地襲來的時代風暴」，使「新一代知識份子」驀然覺醒到美、日「殖民主義者」對自己社會的壓迫，因而也使他們「重新發現瑰麗的鄉土」。他認為，陳少廷的《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正給新一代知識份子提供了最佳的鄉土資料，「指引人們去了解臺灣新文學運動的來龍去脈」。葉石濤相當讚賞地說：「這的確是一本好書；對於有志於撰寫較厚重的臺灣文學史的後代作家，提供了一條研究的正確路線。」<sup>(119)</sup> 對於陳少廷在這本書結論中對日據下臺灣新文學的「歷史意義」的詮釋——和他的〈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一文所說的相同，尤其是對其受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影響、光復後已完成其抗日使命而再也沒有「臺灣文學」可言的

(117) 陳少廷，《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頁5-6。

(118) 黃得時，〈黃序〉，收於陳少廷，《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頁3-4。參見黃得時，〈臺灣新文學運動概觀〉，《臺北文物》3:2 (1954年8月)，頁2-12；3:3 (1954年12月)，頁18-22；4:2 (1955年8月)，頁104-120。陳少廷在該書〈後記〉中明白交代了他的書以黃得時的文章為骨幹，並指出黃得時曾審閱指正書稿，而黃得時也為該書做序（陳少廷，《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頁1-4、203-204）。然而即使如此，十年之後的八〇年代末，陸續有批評該書為「抄襲」者，譬如傅博，〈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評價問題〉，頁110；陳芳明、彭瑞金，〈陳芳明、彭瑞金對談：釐清臺灣文學的一些烏雲暗日〉，《文學界》24 (1987年11月)，頁34-35中陳芳明的談話。八〇年代末臺灣文化民族主義者對陳少廷此書的中國民族主義觀點的批判，以及陳少廷的回應，見筆者先前的研究：蕭阿勤，〈一九八〇年代以來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頁35。

(119) 葉石濤，〈簡介陳少廷先生的「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書評書目》53 (1977年9月)，頁34-37。

明白陳述，葉石濤更特別加以肯定。他說：

尤其本書最末第七章「臺灣新文學運動的歷史意義」裡，最能看出陳少廷先生的闡釋能力。他指出，臺灣新文學運動是直接受到祖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而發生的。這一點雖然過去已有幾個人撰文指出，但由他來重新肯定，更顯得有份量。其次，他說臺灣新文學運動由語言改革（提倡白話文）開始，繼而抨擊舊文學最後才有新文學的創作。然而臺灣新文學運動並不全是抄襲五四的遺風的，它本身有其特色。我以為這特色不外是特殊的鄉土性。他又論及到臺灣新文學為抗日民族運動的一翼，後來接受社會主義思想的洗禮而走向尖銳化；這論談同我們所見相同，真叫人歡喜。至於他說到「臺灣新文學運動因臺灣光復，重回祖國懷抱而永遠結束了……自然就再沒有所謂『臺灣文學』可言了（鄉土文學應當別論）。」，這真是一針見血的持平之論。事實上，臺灣光復以後，「臺灣文學」已成過去，但鄉土文學的提倡正方興未艾，承繼臺灣新文學運動的抵抗精神的後代作家正在力求挽回狂瀾呢！（底線為筆者所加）

即使葉石濤在此沒有忘記提到日據下臺灣新文學運動不全是沿襲五四遺風，自有其「特殊的鄉土性」，但他在這裡並沒有對這種特殊性大加發揚之意。從六〇年代中期復出文壇，直到七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時期，葉石濤事實上認為鄉土文學當然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而文學表現應追求台灣地域認同（鄉土性）與中國民族認同（民族性）的平衡，這兩種認同並非無法並存。<sup>(120)</sup>

(120) 蕭阿勤，〈一九八〇年代以來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頁 33-34；蕭阿勤，〈民族主義與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頁 105-112。楊雲萍於五〇年代中，在前述《臺北文物》三卷二期〈北部新文學·新劇運動座談會〉表達如下的看法（《臺北文物》3:2 [1954]，頁 4）：

臺灣的文學，當推明末的沈斯庵為始祖。自開始就是反清，有濃厚的民族色彩，這一直到了日據時期迄日人投降為止，或意識的或無意識的，蘊藏在從事的這種工作的人們底腦裡。

本來臺灣的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延長，中國文化的變貌，只是臺灣在日據時期，是日人的殖民地，所以一部份具有殖民地文化的性格。這是客觀條件決定臺灣文化的性格。臺灣文化底一支軍的臺灣文學所以也自有它獨特的發展，雖非是中國文學的主流，但自有其值得注目的價值。（底線為筆者所加）

楊雲萍認為臺灣文學雖有其獨特性而非中國文學主流，但仍屬於中國文學。葉石濤的觀點正與其類似。

從他在六〇年代中期發表〈臺灣的鄉土文學〉之後到七〇年代初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重新受到重視之前，葉石濤一直專注於日據時期到戰後本省籍作家與作品的批評，成為這時期小說方面唯一重要的本省籍文學批評者。同時做為在日據下成長的資深作家，他成為這期間用心思考日據下臺灣新文學（包括戰後世代本省籍作家的文學創作）對殖民統治結束後現在的「我們」的意義、建構對這一段文學往事之集體記憶的最重要人物。<sup>(121)</sup> 因此葉石濤對陳少廷一書的評價，實有重要的意義，可以說代表親身參與過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活動的資深一代對戰後世代成員探索這一段過去的方式的肯定。

另一個類似的例子，則是王詩琅為李南衡主編、一九七九年出版的五卷《日據下臺灣新文學》選集作序。這套書的其中一卷，收集了前述五〇年代中期親身參與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資深一代在《臺北文物》兩期特輯中發表的大部份資料。王詩琅在這套書的前序中，概述了當時臺灣新文學的源起與發展後，仍然延續他在七〇年代之前的看法，強調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做為抗日新文化運動的一支，並且「跟五四的中國大陸新文學亦步亦趨」，其「基調本來就具有民族思想和民族意識」。<sup>(122)</sup> 另外，葉石濤與和他一樣年紀但在戰後才自學中文寫作的本省籍小說家鍾肇政（1925-）合力主編的《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八卷，也在這一年出版。在這部卷帙龐大的套書的首頁，擔任執行編輯的林瑞明等人在說明編輯宗旨與動機時，開宗明義地強調：

臺灣同胞以武裝或非武裝抵抗日本帝國侵略五十年，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極具沈雄悲壯的一章。日據下的臺灣新文學運動，不僅是中國抗日的民族文化鬥爭的一環，而且也是臺灣思想史上的一個啓蒙運動，它在中國近代的新文學史上，實具有不可磨滅的意義。<sup>(123)</sup>

七〇年代末陳少廷的簡史與李南衡、鍾肇政、葉石濤主編的作品、文獻集的

(121) 蕭阿勤，〈民族主義與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頁105。

(122) 王詩琅，〈日據下臺灣新文學的生成及發展——代序〉，收於李南衡主編，《日據下臺灣新文學，明集》，五卷（臺北：明潭，1979），各卷頁9-10。李南衡生於1940年，臺灣臺北市人。

(123) 張恆豪、林梵（林瑞明）、羊子喬，〈出版宗旨及編輯體例〉，收於鍾肇政、葉石濤主編，《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八卷（臺北：遠景，1979），各卷頁1。

出現，正標誌著保釣運動以來，回歸鄉土文化潮流中重新探索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此一發展的高峰。另一方面，從事後回顧的觀點來看，這個在七〇年代最後一年興起的高峰，也象徵著以中國民族主義集體經驗敘事模式建構的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之集體記憶，即將步入式微。<sup>(124)</sup> 在這一年的年底，高雄美麗島事件爆發，隨之而來的是八〇年代前半葉黨外政治反對運動人士激進地鼓吹「臺灣意識」，公開地進行「臺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動員，反對運動於是由追求體制內的民主化轉變到民族主義的族群訴求。<sup>(125)</sup> 在這個過程中，本省籍文化界人士也產生相應的轉變。許許多多——包括本文前面提到過的絕大部份——不同世代的本省籍文學界人士，或快或慢、或強或弱地改變了他們的民族／國家認同。伴隨在其中發展的，是他們以一個筆者稱之為「臺灣民族主義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出發，關於整個「臺灣（民族）文學」——包括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集體記憶建構活動。<sup>(126)</sup> 在這種公共領域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或集體記憶的參考架構下，對於「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是什麼」、「對『我們』有何意義」等問題，如同本文一開始所提到的，有了截然不同的答案：在殖民統治下的臺灣作家乃基於臺灣主體意識而創作；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是貢獻於臺灣民族的形成、追求臺灣民族解放的；臺灣人不是中國人，而日據時期的臺灣新文學也不是中國文學。

## 五、結論

從五〇年代中期後陸續出現王詩琅、葉石濤、吳瀛濤、黃得時等人回顧日據下臺灣新文學的文章，到七〇年代陳少廷等戰後世代知識份子時局變動下重新探索這一段文學的過去，以及如葉石濤等日據時期成長的世代加入這一波以戰後

(124) 許俊雅認為李南衡與鍾肇政、葉石濤主編的兩套書的出版，「為七〇年代的臺灣文學研究做了光榮的結束」。見許俊雅，〈「日據時期臺灣文學」研究概況〉，頁9。呂正惠則指出，「由七三年開始的臺灣文學『出土』風潮，到七九年這兩大套選集的出現而暫告一個段落。」見呂正惠，〈日據時代臺灣新文學研究的回顧〉，頁150。

(125) 王甫昌，〈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一九七九～一九八九年兩波挑戰高峰的比較〉，《臺灣政治學刊》1（1996），頁129-210。

(126) 參見筆者先前研究的分析：蕭阿勤，〈一九八〇年代以來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蕭阿勤，〈民族主義與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A-chin Hsiao (蕭阿勤)，*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世代成員爲主的集體記憶建構，我們可以說，這漫長的二十幾年間，從日本殖民統治下成長的資深本省籍作家到戰後完全在國民黨統治下成長的世代，在回顧以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爲主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歷史經驗時，他們的參考架構，基本上和戰後臺灣社會公共領域中國國民黨所建構、容許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集體記憶模式，沒有太大的差異。或者可以說，他們事實上相當程度地接受了這種模式。不僅是戰後世代在七〇年代憑藉著這個中國民族主義的集體記憶模式來探索、理解他們未曾經歷的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資深作家至少從五〇年代中期以來，在公共領域也依照這個模式回顧他們親身經歷的一段過去。

就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而言，他們受到當時臺灣政治社會情境變動的激發，重新建構日據下臺灣新文學的集體記憶，藉著探索過去以尋求當前與未來意識和行動的定位與指引。戰後世代的這些嘗試，如果有任何區別於之前資深本省籍作家之處，至多也只是改良主義的。這種集體記憶建構的改良主義，正和這個時期戰後世代社會政治變革的主張一樣，都是在中華民國體制內所進行的改良主義。尤其是對於本省籍的戰後世代成員而言，這期間他們關於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集體記憶的重新建構，重點是希望將這一段過去納入中國民族主義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彰顯其中國性，使這一段本省人的過去及其中國性在公共領域獲得承認。這就像這時期《大學雜誌》與黃信介、康寧祥等從事的黨外運動涉及省籍的社會政治革新主張一樣，主要是在體制內要求本省人的公民身份被充分承認、獲得平等的公民權與政治權。

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成員將日據下臺灣新文學放入一個中國民族主義集體經驗敘事模式，使它成爲其歷史情節發展的一部份，以理解這一段殖民統治下文學的往事究竟「是什麼」、「爲何而發生」、「與我們的關係是什麼」——或者更精確地說，「它對『我們』而言，是什麼」、「他對『我們』而言，爲何而發生」、「對『我們』的意義是什麼」、「『我們』爲什麼要在乎它？」。同時，藉著這個特定的民族主義集體經驗敘事模式回答這些問題、理解——或者說建構——這一段過去，這些戰後世代成員也就回答了「我（們）是誰」、「我（們）爲何生在這個時代、社會」、「這個時代、社會對我（們）或是我（們）對這個時代、社會的意義是什麼」、「我（們）要做什麼、如何行動」等與集體認同和行動有關的問題，因此也就理解——或者說建構——了他們自己。七〇年代初最早發表文章、較完整地探討日據



時期臺灣新文學的林載爵，在一九七七年為林瑞明的《楊遠畫像》作序時，回顧他如何在國際局勢的衝激下，體認到中國苦難的民族命運，進而「注視臺灣的現實」，然而又為當前的現實與過去的歷史脫節而苦惱。林載爵如此表白：

這個我所注視著的現實，如何連接過去的歷史？如何從過去歷史的綿延中，把握這個現實的進展方向？以及這個現實的歷史是如何歸屬於中國的歷史之中？我努力思索著這些問題，可是卻得不到具體而確切的解答，我深深感到，我們與過去是脫節的。……

就在思想苦悶的時候，我認識了楊遠，第一次拜訪他時，他平靜溫和地告訴我一些臺灣近代歷史的片斷，這是我第一次接觸這段歷史，臨走時還借了一本中日文對照的「送報伙」。……歷史之流奔騰而來，而歷史之門也就這樣敞開了，現實連結了過去，而過去歸回了源頭。脫節的一段年代被縫合了。

通過多災多難，但又不屈不撓的楊遠，過去的一段歷史具體地呈現出來，漸漸的，我又知曉了賴和、楊華、呂赫若、張深切、蔡惠如、林幼春、林獻堂、蔣渭水，……等人，由這些人，我又明瞭了臺灣近代的抗日民眾運動，由對民眾運動性質的了解，我更深刻地體認了中國近代國民革命史的推展，於是個人的生命有了歷史的歸屬，這個我們所注視著的現實也有了歷史的歸屬。<sup>(127)</sup>（底線為筆者所加）

這段話顯示的是：集體自我（collective self）的建構與集體過去的建構，可以說是相互辯證的。就如筆者先前的研究所指出，「集體」（的界線和認同屬性）與「記憶」（的內容和意義）兩者，正是互相建構而又互相限制的，因此也就是相互辯證的。<sup>(128)</sup>

在談到楊遠的小說刻畫日據時期臺灣人所受的痛苦時，林瑞明認為：

這原是中國人所共同承擔的命運，楊遠作品的更大意義即在於此。

(127) 林問耕（林載爵），〈歷史的篝火——「楊遠畫像」序〉，收於林瑞明，《楊遠畫像》（臺北：筆架山，1978），頁1-2。

(128) 蕭阿勤，〈民族主義與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頁125-126。

他以他所熟悉的背景，寫出中華兒女的哀痛，原不僅僅是狹義的鄉土小說而已。它具有三十年代文學的特質，廣義而言，原本就是中國文學的收穫……

楊達的精神，已被年輕一代的人繼起。

這股新生的力量，正是未來中國的希望。<sup>(129)</sup>（底線為筆者所加）

和楊達朝夕相處一年的林瑞明，也曾經如此描述七〇年代中楊達意外地廣受重視與尊崇的情形，他說：

經過一、二十年的寂寞生活，東海花園現在成爲一個熱鬧的地方，時有訪客。作家、學者、大學生、中學生、中國人、外國人……各色人等都來了。介紹、評論的文章也越來越多，一篇接著一篇出現於報章雜誌。

一度被埋沒的楊達，親眼看到了這熱鬧的日子。

楊達終於戰勝了時間。

昔時風雲，已然消逝，長久寂寞與委屈，如何排解？驟然而至的一片聲名的熱浪，在楊達心中泛起陣陣波動，從與訪客的高談闊論中，他又親切地、理直氣壯地憶起往日的縱橫捭闔，從他們身上，他看到往日在群眾中自己的身影，從他們身上，他看到新一代的希望，越過了臺灣的三十年代，越過了一、二十年的委屈，他還是屬於中國的七十年代吧。<sup>(130)</sup>（底線為筆者所加）

如前所述，不只楊達，事實上包括整個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當這些殖民統治下的文學往事在七〇年代被戰後世代重新發現而民族化爲一種集體記憶時，它們成爲「中國的」，屬於「中國的七十年代」。戰後的年輕世代成員從這樣的集體記憶中，獲得了面對中國（臺灣）現在與未來的力量，看到了中國（臺灣）現在與未來的希望。而他們自己，就如林瑞明所說的，也把自己視爲追求那個光明希望的民族的兒女。「戰勝時間」的，事實上不是楊達，而是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

(129) 林梵（林瑞明），《楊達畫像》，頁187-188。

(130) 同上註，頁41。

相對地，歷經下一個十年——八〇年代——中黨外、民進黨對國民黨、臺灣意識對中國意識、「獨」對「統」的挑戰與競爭，至少在九〇年代之後，當臺灣民族主義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似乎在政治與文化上逐漸取得社會優勢，成為理解臺灣過去的主要參考架構時，日本殖民時期的臺灣新文學開始被民族化為「臺灣的」，不再被視為中國的。抱持這樣的集體記憶者，獲得了面對臺灣現在與未來的力量，看到臺灣現在與未來的希望，也把自己視為追求那個光明希望的民族的兒女。

讓我們回到本文一開始所提到那令人動容的歷史的一幕吧！做為臺灣新文學之父，辭別人世之前的賴和即使不會那麼悲觀，恐怕也不會料到他們那一代人所努力締造的臺灣新文學，在三十年與五十年之後，分別受到如此不同的對待。而在一旁安慰賴和，有心或無心地說出「一定有人會想到我們的事情」的楊雲萍，大概也不會預見如此的發展。從這三十年與五十年之間的區別，我們理解到：*過去從未遠離我們，只是在不同的時候，以我們無法預料的不同方式回到我們的眼前*。我們可以說，集體記憶與集體認同、集體過去與集體自我的關係是相互辯證、一體兩面的。關於「我（們）是誰」等等的主體（subject）的塑造，從來與我們對過去的塑造是分不開的；而不管是主體的塑造或過去的塑造，都受到特定歷史階段與特定政治力量所左右。民族主義的集體經驗敘事模式，正彰顯這個事實。

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在賴和逝世三十年與五十年左右之後，被不同的民族主義集體經驗敘事模式建構成不同的集體記憶。反省如此的歷史變化，前述傅柯的理論對我們的重大意義於是浮現出來。在西方現代國家發展的歷史脈絡中，傅柯指出：拒絕現代國家加諸個人的主體性與其權力結構，「並不是要擺脫國家及其制度，而是要把我們從國家及與國家關連而將我們個人化（individualization）的那種方式解放出來」，尋找新的主體性形式（斜體字為筆者所加）。<sup>(131)</sup>除了他關於現代國家與主體性建構的理論，提醒我們注意對於歷史的理解如何可能受到現代民族主義的限制之外，傅柯同時也指出：自我知識——就本文而言，尤其是關於集體自我的過去的知識——與自我宰制、知識獲取與服從權力、成為具有某種自我意識的主體與成為某種權力運作的客體，都是一體兩面的相互辯證過程。傅

(131) Foucault, "The Subject and Power," p. 216.

柯這種觀點給我們的啓示是：我們有必要不斷地反省自我與自我對歷史的理解，如何受到特定歷史階段與政治力量渴求特定主體位置的影響——或者說是「誘惑」。如果我們不可能不立定一個主體位置而認識過去，那麼在某些時候、某種程度上抗拒這種渴求的誘惑、超越其限制，也就是掙脫某種權力在我們身上的運作，恐怕是必要的。

過去從未遠離我們，只是在不同的時候，以我們無法預料的不同方式回到我們的眼前，這是一個歷史的教訓。要求自省地「拒絕我們是什麼」——即使只是一次短暫地、稍稍離開自己習以為常的主體位置，對那些涉身於民族／國家歷史敍事鬥爭的人們而言，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種困難，就彷彿要愛敵人如同愛自己那般不容易。民族主義的集體記憶，是對集體自我的謳歌與自戀。然而不過度自戀的人，才能學會如何愛別人。歷經八〇年代以來臺灣意識與中國意識、臺灣獨立與中國統一、臺灣史觀與中國史觀對抗與競爭的臺灣社會所需要的，也許是這些平實的領悟。(132)

定稿日期：2002.03.04

(132) 本文經審查而修訂定稿，即將付印之際，恰值鄭鴻生的《青春之歌：追憶1970年代臺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臺北：聯經，2001）全書出版（其中部分章節曾先行發表於《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001年3月第41期，頁129-204；《海峽評論》在2001年11月第131期後也連載刊出）。筆者在寫作過程中，未及參考鄭鴻生的著作。鄭鴻生以親身參與者的身份，追憶七〇年代初以國立臺灣大學學生為主的戰後世代成員伴隨保釣運動而來的種種言論與行動，提及六〇年代末林瑞明在臺南一中組織名為「丹心會」的社團，「志在恢復漢唐雄風」，「反映出當時青年學子對國家民族的浪漫情懷」；並指出在保釣運動中「用這些激勵民族主義情感的標語來動員學生參與，其有效性無可置疑，而且我們對自己的中國人身份也從未質疑過，對當時絕大部分的臺大學生亦復如此」；「保釣運動是一次沒有族群內涵的運動，也反應出當時大學校園的一般情況」；也談到對他們而言，當時楊逵是以「一位有血有肉的歷史參與者」來呈現日據時期農工運動風貌的（見該書頁39、84-85、90照片說明、151）。鄭鴻生的這些追憶，都佐證了本文關於七〇年代受釣魚臺事件激發的知識青年不分省籍地接受戰後中國民族認同的教化，以及楊逵在這時期的聲譽突起與這些戰後世代成員的關係等論點。

## 引用書目

大學雜誌社

1974 〈「日據時代的臺灣文學與抗日運動」座談會——紀念臺灣光復第二十九週年〉，《大學雜誌》79: 26-33。

文季雜誌社

1973 〈發刊詞：我們的努力和方向〉，《文季》1: 1-2。

王甫昌

1996 〈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一九七九～一九八九年兩波挑戰高峰的比較〉，《臺灣政治學刊》1: 129-210。

王拓

1977 〈廿世紀臺灣文學發展的動向〉，收於氏著，《街巷鼓聲》，頁 81-91。臺北：遠景。

王明珂

1997 《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

王紘久（王拓）

1973 〈一些憂慮：談歐陽子的「秋葉」〉，《文季》1: 76-82。

王一剛（王詩琅）

1959 〈臺灣新文化運動與大陸〉，《臺灣風物》9(5/6): 3-5。

王錦江（王詩琅）

1964 〈日據時期的臺灣新文學〉，《臺灣文藝》1(3): 49-58。

1979(1936) 〈賴懶雲論——臺灣文壇人物論（四）〉，明潭譯，收於李南衡主編，《日據下臺灣新文學，明集 1，賴和先生全集》，頁 399-406。臺北：明潭。

王詩琅

1979 〈日據下臺灣新文學的生成及發展——代序〉，收於李南衡主編，《日據下臺灣新文學，明集》，共五卷，各卷頁 1-12。臺北：明潭。

王曉波

1986[1979] 〈臺灣新文學之父——賴和與他的思想〉，收於氏著，《被顛倒的臺灣歷史》，頁 129-152。臺北：帕米爾。

臺大法言社

1972 〈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辯論〉，《大學雜誌》49: 80-89。

石家駒（陳映真）

1979 〈在民族文學的旗幟下團結起來〉，收於仙人掌雜誌社編，《民族文學的再出發》，頁 223-238。臺北：故鄉。

史君美（唐文標）

1973 〈來喜愛鍾理和〉，《文季》2: 60-76。

仙人掌雜誌編輯部

1979 〈中國的出發〉，收於仙人掌雜誌社編，《民族文學的再出發》，頁 1-4。臺北：故鄉。

羊子喬、陳千武（主編）

1982 《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9-12 卷。臺北：遠景。

朱石峰

1979(1943) 〈回憶賴雲先生〉，明潭譯，收於李南衡主編，《日據下臺灣新文學，明集 1，賴和先生全集》，頁 420-424。臺北：明潭。

朱西寧

1975 〈謁老園丁〉，《中外文學》3(8): 18-21。

李筱峰

1987 《臺灣民主運動 40 年》。臺北：自立晚報。

李南衡(主編)

1979 《日據下臺灣新文學，明集》，共五卷。臺北：明潭。

李魁賢

1978 〈巫永福詩中的祖國意識與愛國意識〉，收於丘爲君、陳連順編，《中國現代文學的回顧》，頁 121-135。臺北：龍田。

尾崎秀樹

1985(1971) 〈戰時的臺灣文學〉，蕭拱譯，收於王曉波編，《臺灣的殖民地傷痕》，頁 185-238。臺北：帕米爾。

何欣

1973 〈歐陽子說了些什麼〉，《文季》1: 43-60。

1979 〈七〇年代的使命文學：論楊青矗和王拓〉，收於氏著，《中國現代小說的主潮》，頁 147-175。臺北：遠景。

呂正惠

1996 〈日據時代臺灣新文學研究的回顧——七〇年代以來臺灣地區的研究概況〉，《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4: 143-170。

1995(1992) 〈七、八〇年代臺灣現實主義文學的道路〉，收於氏著，《戰後臺灣文學經驗》，頁 49-73。臺北：新地。

林惺嶽

1987 《臺灣美術風雲 40 年》。臺北：自立晚報。

林尹文

1979(1974) 〈耕耘者楊達〉，收於楊素絹編，《楊達的人與作品》，頁 127-131。臺北：民眾日報社臺北管理處。

林梵(林瑞明)

1977 〈楊達畫像〉，《仙人掌雜誌》1(3): 235-265。

1978 《楊達畫像》。臺北：筆架山。

林問耕(林載爵)

1978 〈歷史的篝火——「楊達畫像」序〉，收於林瑞明，《楊達畫像》，頁 1-3。臺北：筆架山。

林載爵

1973 〈臺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達與鍾理和之比較〉，《中外文學》2(7): 4-20。

1974 〈日據時代臺灣文學的回顧〉，《文季》3: 133-165。

1976 〈黑潮下的悲歌：詩人楊華〉，《夏潮》1(8): 64-67。

1977 〈黑色的太陽——張深切的里程〉，《夏潮》3(3): 65-70。

1996 《臺灣文學的兩種精神》。臺南：臺南市立文化中心。

林邊(林載爵)

1979 〈忍看蒼生含辱——賴和先生的文學〉，收於李南衡主編，《日據下臺灣新文學，明集 1，賴和先生全集》，頁 455-487。臺北：明潭。

吳瀛濤

1971 〈概述光復前的臺灣文學(一)〉，《幼獅文藝》216: 274-282。

1972 〈概述光復前的臺灣文學(二)〉，《幼獅文藝》221: 54-60。

周道濟

1971 〈我國中央民意代表的新陳代謝問題〉，《東方雜誌》4(11): 7-10。

1971 〈我國中央民意代表的新陳代謝問題〉(增修版)，《天聲雜誌》1(3): 2-7。

1972(1971) 〈我國中央民意代表的新陳代謝問題〉，收於廬山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當前國是言論集》，頁 141-152。臺北：廬山。

明鳳英(紀錄)

1979 [1977] 〈中國文學往何處去？中西文藝思潮座談會〉，收於仙人掌雜誌社編，《民族文學的出發》，頁 19-35。臺北：故鄉。

胡秋原

1976 〈胡序——談楊遠先生及其作品〉，收於楊遠著，《羊頭集》，頁 3-12。臺北：輝煌。

周婉窈

1997 《臺灣歷史圖說》。臺北：聯經。

松永正義

1990 〈臺灣新文學運動研究的新階段〉，《新地文學》1: 32-51。

洪三雄

1993 《烽火杜鵑城：七〇年代臺大學生運動》。臺北：自立晚報。

翁佳音

1990 〈簡介國內的「臺灣抗日史及其相關題目」研究狀況〉，《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10: 120-126。

唐文標

1973 〈歐陽子的創作背景〉，《文季》1: 44-45。

1973 〈詩的沒落：香港臺灣新詩的歷史批判〉，《文季》1: 12-42。

高上秦(高信疆)

1976(1973) 〈探索與回顧——寫在「龍族評論專號」前面〉，收於趙知悌編選，《文學休走——現代文學的考察》，頁 162-171。臺北：遠行。

陳映真

1977 〈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仙人掌雜誌》1(5): 65-78。

1984[?] 〈孤兒的歷史·歷史的孤兒：試評「亞細亞的孤兒」〉，收於氏著，《孤兒的歷史·歷史的孤兒》，頁 83-95。臺北：遠景。

陳少廷

1970 〈論這一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志向(代序)〉，收於大學叢刊編委會編，《這一代中國知識份子的見解》，頁 1-10。臺北：環宇。

1971 〈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選問題——兼評周道濟先生的方案〉，《大學雜誌》46: 13-16。

1972(1971) 〈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選問題——兼評周道濟先生的方案〉，收於廬山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當前國是言論集》，頁 351-358。臺北：廬山。

1972 〈再論中央民意代表的改選問題〉，《大學雜誌》49: 93-98。

1972 〈五四與臺灣新文學運動〉，《大學雜誌》53: 18-24。

1977 《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臺北：聯經。

陳正醒

1998(1981) 〈臺灣的鄉土文學論戰(1977-1978)〉，收於《臺灣鄉土文學、皇民文學的清理與批判》，頁 129-181。臺北：人間。

陳芳明、彭瑞金

1987 〈陳芳明、彭瑞金對談：釐清臺灣文學的一些烏雲暗日〉，《文學界》24: 17-46。

許俊雅

1994 〈「日據時期臺灣文學」研究概況〉，收於氏著，《臺灣文學散論》，頁 1-36。臺北：文史哲。

尉天驄

1973 〈幙幕掩飾不了污垢：對現代主義的考察，兼評歐陽子的「秋葉」〉，《文季》1: 61-75。

1976 《路不是一個人走得出來的》。臺北：聯經。

梁景峰

1979(1976) 〈春光關不住——論楊逵的小說〉，收於楊素絹編，《楊逵的人與作品》，頁 239-260。臺北：民眾日報社臺北管理處。

黃得時

1954 〈臺灣新文學運動概觀（一）〉，《臺北文物》3(2): 2-12。

1954 〈臺灣新文學運動概觀（二）〉，《臺北文物》3(3): 18-22

1955 〈臺灣新文學運動概觀（三）〉，《臺北文物》4(2): 104-120。

1972 〈臺灣光復前後的文藝活動與民族性〉，《新文藝》190: 37-47。

1977 〈黃序〉，收於陳少廷，《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頁 1-4。臺北：聯經。

黃春明

1973 〈莎啞娜拉·再見〉，《文季》1: 97-131。

彭瑞金

1991 〈以文學為生命作見證——鍾理和集序〉，收於氏編，《鍾理和集》，頁 9-12。臺北：前衛。

1992 〈當前臺灣文學的本土化與多元化——兼論有關臺灣文學的一些異說〉，《文學臺灣》4: 11-36。

廖漢臣

1964 〈臺灣文學年表〉，《臺灣文獻》15(1): 245-290。

傅博

1987 〈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評價問題〉，《文星》104: 107-114。

張光直(編)

1975 《張我軍文集》。臺北：純文學。

張恆豪、林梵(林瑞明)、羊子喬

1979 〈出版宗旨及編輯體例〉，收於鍾肇政、葉石濤主編，《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共八卷，各卷頁 1-6。臺北：遠景。

張景涵(張俊宏)等

1971 〈國是諍言〉，《大學雜誌》46: 1-10。

張良澤

1973 〈鍾理和的文學觀〉，《文季》2: 48-59。

1974 〈鍾理和作品的日本經驗與祖國經驗〉，《中外文學》2(11): 33-57。

1975 《鵝媽媽出嫁》。臺南：大行。

1975 〈不屈的文學魂——論楊逵兼談日據時代的臺灣文藝（四之一）〉，《中央日報》，10月22日。

1977 〈吳新榮先生傳略〉，《大學雜誌》105: 20-21。

1979(1975) 〈不屈的文學魂——論楊逵兼談日據時代的臺灣文藝〉，收於楊素絹編，《楊逵的人與作品》，頁 209-226。臺北：民眾日報社。

1979(1975) 〈序論〉，收於楊逵，《鵝媽媽出嫁》，頁 1-5。臺北：民眾日報社臺北管理處。

溫美玲

1979(1975) 〈鐵肩擔道義的楊逵〉，收於楊素絹編，《楊逵的人與作品》，頁 169-178。臺北：民眾日報社臺北管理處。

楊雲萍

1943 〈賴和氏追憶〉，《民俗臺灣》3(4): 30-31。

1979(1943) 〈追憶賴和〉，明潭譯，收於李南衡主編，《日據下臺灣新文學，明集 1，賴和先生全集》，頁 409-411。臺北：明潭。



楊青矗

1978 〈現實與文學〉，收於丘為君、陳連順編，《中現代文學的回顧》，頁 225-230。臺北：龍田。

楊素絹(編)

1979(1976) 《楊遠的人與作品》。臺北：民眾日報社臺北管理處。

楊 遠

1973(1937) 〈模範村〉，《文季》2: 105-142。

1979(1975) 〈後記〉，收於其《鵝媽媽出嫁》，頁 210-212。臺北：民眾日報社臺北管理處。

1979(1975) 《鵝媽媽出嫁》。臺北：民眾日報社臺北管理處。

葉石濤

1965 〈臺灣的鄉土文學〉，《文星》97: 70-73。

1975 〈從「送報伙」、「牛車」、到「植有木瓜的街鎮」〉，《大學雜誌》90: 62-65。

1975 〈楊遠的「鵝媽媽出嫁」〉，《大學雜誌》87: 33-35。

1977 〈簡介陳少廷先生的「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書評書目》53: 34-37。

1987 《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

1997 《臺灣文學入門》。高雄：春暉。

齊益壽

1978 〈鄉土文學之我見〉，收於尉天驄編，《鄉土文學討論集》，頁 587-595。臺北：遠流。

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

1995 《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報告》(含《附冊》)。臺北：臺大哲學系事件調查小組。

劉若君

1973 〈鍾理和短篇小說讀後〉，《文季》2: 77-81。

趙天儀(編)

1979 《臺大哲學系事件真相——從陳鼓應與「職業學生」事件談起》。臺北：花孩兒。

趙知悌

1976 〈序〉，收於氏編選，《文學休走——現代文學的考察》，頁 1-13。臺北：遠行。

趙知悌(編)

1976 《文學休走——現代文學的考察》，臺北：遠行。

鄭鴻生

2001 《青春之歌：追憶 1970 年代臺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臺北：聯經。

鍾肇政、葉石濤(主編)

1979 《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共八卷。臺北：遠景。

鍾肇政

2000 《臺灣文學十講》，莊紫蓉編。臺北：前衛。

鍾理和

1973 〈貧賤夫妻〉，《文季》2: 82-90。

蕭阿勤

1999 〈1980 年代以來臺灣文化民族主義的發展：以「臺灣(民族)文學」為主的分析〉，《臺灣社會學研究》3: 1-51。

2000 〈民族主義與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一個文化(集體)記憶變遷的探討〉，《臺灣史研究》6(2): 77-138。

賴和紀念館(編)

1994 《賴和研究資料彙編(上)》。彰化：彰化縣立文化中心。

顏元叔

1973 〈臺灣小說裏的日本經驗〉，《中外文學》2(1): 106-121。

1973 〈臺灣小說裏的日本經驗〉，《中華日報》，1973年10月11-13日

1979(1973) 〈臺灣小說裏的日本經驗〉，收於楊素絹編，《楊逵的人與作品》，頁55-84。臺北：民眾日報社。

廬山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

1972 《當前國是言論集》。臺北：廬山。

Anderson, Benedict

1991(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 and extended ed. London: Verso.

Breuilly, John

2001 "The State and Nationalism." In Montserrat Guibernau and John Hutchinson, eds., *Understanding Nationalism*, pp. 32-52. Cambridge, UK: Polity.

Foucault, Michel

1982 "The Subject and Power." In Hubert L. Dreyfus and Paul Rabinow,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pp. 208-226.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Gellner, Ernest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obsbawm, Eric and Terence Ranger, eds.

1983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siau, A-chin (蕭阿勤)

2000 *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London: Routledge.

Liao, Bing-hui (廖炳惠)

1993 "Rewriting Taiwan's National History: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as Spectacle." *Public Culture* 5(1): 281-296.

Yen, Yuan-shu (顏元叔)

1973 "The Japan Experience in Taiwanese Fiction." *Tamkang Review* 4(2): 167-188.

## **Nationalizing Collective Memory in 1970s Taiwan: The Postwar Generation and Its “Rediscovery” of Taiwanese Colonial Literature as Anti-Japanese Resistance**

A-chin Hsiau\*

###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how during the 1970s Taiwan’s postwar generation rediscovered Taiwanese literature writte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nd how that literature represented a form of anti-Japanese resistance. I argue that the postwar generation drew upon a Chinese nationalist narrative of history to “nationalize” the island’s colonial literary past so as to claim affinity with a Chinese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anti-Japanese resistance. The exploration of the past helped this generation to make sense of the dramatic sociopolitical changes affecting Taiwan in the 1970s and, in turn, to form a sense of their collective self.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present, however, was also infused with contemporary political meaning. I reveal how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llective memory carried politically reformist implications that reflected the postwar generation’s social and political activism during the 1970s. For members of that generation who were born in Taiwan and whose parents suffered under Japanese colonialism, the rediscovery of their colonial literary past as a form of anti-Japanese resistance constituted a political claim to “Chineseness” and therefore a demand that Taiwanese were equally full citizens of the Chinese state. This case study suggests that although such a form of subjectivity based upon the nationaliza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might serve to advance immediate political goals, ultimately it constitutes a barrier to understanding Taiwan’s past and thus to enlightenment.

**Keywords:** identity, narrative, nationalism, collective memory, public sphere,  
Taiwanese colonial literature

---

\*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Preparatory Office, Academia Sinica.